

鄭學稼作

蘇聯黨獄

蘇聯研究叢書第二種

上海眞理出版社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74028

~~010872~~

鄭學稼作

蘇聯黨獄

蘇聯研究叢書第二種



上海真理出版社發行

1937

蘇聯黨獄目次

寫在卷首

- 第一 開除充軍與投降……………一
- 第二 蘇維埃天國中的沙皇……………一九
- 第三 基洛夫血的代價……………三五
- 第四 第一次天才的作品……………五五
- 第五 新哈姆雷特……………八二
- 第六 正動與反動……………一〇九
- 第七 天平上的兩雄……………一二六

寫在卷首

人既爲真理而生，如不爲真理而鬥，雖生猶死。

目前，有一個真理之賊，在沾污人類光榮的歷史，我們如愛護真理，如忠於真理，不起而仗義執言，何以爲生？

這位真理之賊，就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販賣者，用「盲動」毒藥企圖絞殺中華民族的罪魁，馬克思主義叛徒俱樂部——第三國際的頭領史大林。

史大林既以曹操之才，司馬昭之心，篡竊布爾塞維克的政權，又以秦始皇之智，撲滅馬克思主義與傳統。其最大證據，是騎在無產階級頭上的官僚專政，與兩次莫斯科的「公判」。

我們可以不管史大林與他的政敵之政治上的鬥爭，但決不容以格柏烏排演侮辱真理的醜戲。爲人類整個歷史計，爲中華民族生存計，我不能不在中國純潔青年面前，宣讀史大林的罪狀——蘇聯黨獄。

史大林用「反革命」去咀罵自己的政敵托洛斯基；又用「托洛斯基主義者」的帽子，去阻止忠於真理者對他的聲討。我雖然不只一次地被中國小史大林，「告發」爲托氏的門徒，但決不因而退却。不，正爲着不慣於忍受這樣卑劣手段的待遇，毫無政治派別的我，反鼓着所有的勇氣，衝上前去，以殉真理。

本書寫作的目的與動機，卽在乎此。

學稼一九三七，四，二三寫於上海

第一 開除充軍與投降

一九二三年，爲着「黨內工人民主」與「國家工業化」的問題，在列甯死後的聯共裏，發生了重大的風波。開始是當年十月十日托洛斯基給中央執委會與監察會攻擊黨內官僚化等的一封信，到政治局排斥托氏見解並開始「托洛斯基主義」的公開論戰時，十月十五日，中委會中的要人，如畢亞塔考夫（Y. L. Pyatakov），普立奧布蘭曾斯基（Preobrazhensky），施列潑立亞考夫（L. P. Serobr'yakov），史米爾諾夫（I. N. Smirnov），莫拉洛夫（N. I. Muralov），維·史米爾諾夫（V. Smirnov）等四十六人，聯名宣言反對史大林，季諾維夫，與布哈林三巨頭的政策。拉狄克（K. B. Radok）雖未參加，但另信通告在政治局中與托氏等合作。拉可夫斯基（Rakovsky）等以身任外交官的緣故，未曾列名，但行動及主張，則與托等一致，這些人，在黨爭史上，叫做「莫斯科反對派」（Moscow Opposition）。

一九二五年，不滿于史大林的中派與布哈林的右派，所主持的右傾，以及受列

雷格勒與莫斯科工人左傾行動的威脅，以季諾維夫（G. E. Zinoviev）與卡米尼夫（L. B. Kamenev）爲首，領導蘇柯爾尼可夫（G. Y. Sokolnikov），克魯普斯加亞（Krupskaya）〔卽列甯夫人〕，蘇魯茨基（Zalutsky）等，以反對史布二人之富農（kulak）政策及「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史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托姆斯基四巨頭鬥爭，這些人，在黨爭史上，叫做「列甯格勒反對派」（Leningrad Opposition）。

「莫斯科反對派」與「列甯格勒反對派」，由鬥爭的發展，與鬥爭的共同對象，是中派與右派的關係，不久聯合起來，稱爲「聯合反對派」（Opposition Bloc），或稱爲「聯合反對派，布爾塞維克，列甯派」（Opposition Bloc of Bolshevik Leninists）。他們創立一個政綱，提出於一九二七年十五次黨代表大會，這政綱自季諾維夫們投降起，成爲托洛斯基派約十年左右行動的綱領。

以上鬥爭的對象，都屬於黨內的政策。按照革命政黨組織的原則，對這些政策，應該無限制地允許在黨內討論，決不能視爲犯法的行爲。但史大林與布哈林的政

權，却非如此，對於異己者，取高壓的手段。到最後，不准他們公開對人民發表意見。他們只好手寫論文，如托氏之我們所給的與我們所得的是什麼呢（What We Gave and What We Got）這本書，在當日就是手寫本。手寫對於宣傳的效率，自然十分遲緩。他們爲着便利計，勢被迫于設立秘密小規模的印刷所，暗中印發傳單及小冊子，但這個行爲，在蘇聯國內是犯法的，史布二人遂利用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先命令格柏烏（G. P. U.）逮捕主持印刷的人，而後在十五次黨代表大會中宣佈反對派是勾結白黨的將軍烏蘭吉（Peter Wrangel）。反對派爲着這種案件重大，努力偵查，結果真相大明，所謂烏蘭吉白黨將軍的部下，不是反對派的「同志」，而史大林布哈林聯合政權下的格柏烏，由格柏烏長官孟真斯基（Manzhinsky）派他混入反對派中，而後用爲檢舉的證據。這個手段，經公佈後，史大林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聯共執監聯席會上，與以巧妙的辯護說：「說到那位幫助國家政治偵緝處（即格柏烏）發現反革命組織的舊烏蘭吉軍官，反對派就搖頭擺尾，大喊大叫。烏蘭克的舊軍官……原來是國家政治偵緝處的代表。如若這位烏蘭吉舊軍官幫

助蘇維埃政權來發現反革命的陰謀，那有什麼不好之處呢？誰能否認蘇維埃政權有權去吸引舊軍官到自己方面來，利用他來發現反革命的組織呢？」（中譯本論反對派三三二頁）。自然誰也沒有權力，阻止史大林幹這宗事，等於現在沒有權力，阻止在內戰期中，站在孟塞維克右派方面反對布派之國家檢察官維興斯基（Vysinsky），用「法西斯瘋狗」，要求殺史大林自己曾姘過一時之季諾維夫們的行動。勾結烏蘭吉將軍部下的罪名，雖然洗刷，而設立印刷所的大罪，自然不能放過。把牠作為反革命證據之一，於是在聯共，在第三國際，繼續地開除了一大批的要人。

這些前後被開除的人物，在今日不是成為史大林表現其天才的傑作——公判的主角，便是成為國際反對派運動的健將。就國際方面說來，在德國有馬斯洛夫（Maslow）與費茨爾（Ruth Fischer），這二人被史大林在論反對派中罵得不成人，離開第三國際，便成立列甯團（Leninbund），因有實力，第三國際又向他們弔膀子，但自一九三三年德國共黨墮落起，他們與史大林的國際斷絕情絲，走到托洛斯基的反對派（詳後）來。在法國有羅斯米爾（Ros ner），蒙那提（Monatto），羅立

沃 (Loriot) , 蘇巴林 (Savarine) 等的老黨員。和接繼他們的格羅 (Girault) 與托蘭德 (Trent) 。蒙那提與死前羅立沃，受官僚專制的刺激，以為共產主義者都不是真為工人謀幸福，而復歸于革命的工團主義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 。格羅後來重返史大林黨，托蘭德暫時與托派的組織合作，但不久即脫離關係，獨自成立一小派別，理論上常接受托派的觀點。在比利時有萬·沃維爾士特拉登 (Van Overstraton) ，他自開除後，一時 (一九一九至三〇) 退出政治活動的舞台，但他的同志，與該國托派之國際共產主義同盟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相聯繫。在意大利有共產黨創立者布狄加 (Bordiga) ，方離開法西斯的牢獄，便被史大林的第三國際，以前兩三年「贊助托洛斯基反革命者」的罪名開除。在美國有干濃 (Canon) ，史瓦比克 (Swabeck) 與薩茨曼 (Max Shachtman) 等共黨中委，于一九二八年，開除黨籍，罪名是「擁護托洛斯基主義」。這幾個人，現在是第四國際美國支部的主持人。干濃罪名的由來，是把托氏批評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的綱領草案，走私地運出蘇聯國境。在加拿大，當黨總書記麥唐納 (MacDonald) 驅逐出黨後，中委

史匹克脫 (Spector) 也遭同一的運命。在墨西哥，黨的領袖蒙遜 (Monzon)，巴茲 (Bach) 及李維拉 (Rivera) 以各種政治理由開除黨籍，其中李氏是這次爲托落斯基取得居留權的著名藝術家。在奧大利，黨領袖史脫拉塞 (Strasser)，離開史大林黨，走入反對派的陣營。在中國有陳獨秀以夾帶「托落斯基主義」的違禁品，作爲史大林主義對中國盲目指導之懺悔的祭禮。在西班牙，有甯 (Nin) 與安特列德 (Andrade) 以托派嫌疑驅逐出黨，甯氏是現在該國統一馬克思主義黨的領袖，又是被工人綽號爲「西班牙列甯」。

在聯共方面，當時被開除黨籍的有下列與列甯共同手創蘇聯的同志：托落斯基，拉可夫斯基（至列甯逝世止，爲烏克蘭共和國領導者及烏克蘭黨政治局首領），拉狄客，史米爾諾夫（西伯利亞軍事革命委員），普立奧布蘭曾斯基（十月革命時烏拉黨組織者之一，一九二〇年在列甯指導下任黨書記），施列潑立亞考夫（一九二〇年在列甯指導下任黨書記），史密加 (Smilga)（芬蘭十月革命組織者），季諾維夫（第三國際主席及列甯各勸蘇維埃主席），卡米尼夫（莫斯科蘇維埃主席政

治局主席)，蘇柯爾尼可夫（駐英大使）。巴卡奕夫（Bakayev），蘇魯茨基，莫拉洛夫，薩發洛夫（Safarov），莫拉茨柯夫斯基（Mrazhkovsky）畢亞塔考夫等。

國際各支部，對於這種手段，多保持緘默，只有比利時的支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十五票對三票通過反對開除上述各執監委及十月革命領袖的黨籍，並要求第三國際開大會討論。翌年三月，史大林令比黨開會開除沃維爾士特拉登等，此後就沒有這樣的糾紛。因為，第三國際史大林化，各支部的領袖，多成為領盧布的革命騙子（參考中國共黨之情況，更為明瞭）。這些騙子的任務，是在他總頭腦史大林指導之下，過着奴隸與忠順的生活。沒有一個支部，一個黨員敢批判上層的政策與行爲，只有和農奴一樣對於農奴主的服從。到今日，盲目地服從成為史大林主義之所以成立的唯一前提。

「聯合反對派」的領導者，對於開除，有的忍受充軍的苦楚，而季諾維夫一派，則立即投遞悔過書。接着史大林的中派左傾，向右方開刀，從「豬」圈裏，把布哈林的右派反對派拉出來，置于組上，經不起史氏霍霍鋼刀的威脅，「右派三巨頭」

——布哈林，賴可夫與托姆斯基——以及他的部下也俯首于史大林座下，叩稱：「奴輩此後永不敢冒犯虎威矣」。

隨「右派反對派」的清算，一九二九年第三國際又開除了另一批各支部領袖。

在美國，有拉夫斯吞 (Lovestone)，在意大利有塔斯加 (Serra Tasca)，及巴拉斯哥 (Blasco)，在捷克有希斯 (Hais) 及齊力克 (Jilek)，在法國有托里沃 (Doriot)，在瑞典有基爾旁 (Kilboorn)，在西班牙有現加泰隆省共產主義運動領袖摩林 (Maurin) 等。

在蘇聯以外的第三國際支部，被開除黨籍者，自然只有離開黨，同時離開黨後，也沒有別的可能處分，在蘇聯國內，那就沒有那麼簡單。蘇聯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與黨政見不同的人，不能沒有處分，這處分就是充軍，充軍的方法和沙皇一樣，所不同的是沙皇的警察，換為史大林的格柏烏而已。曾不可一世的十月革命領袖當接到格柏烏命令後，立即收拾行裝，于二十四小時內出發。第一批充軍者計三十人。內有拉可夫斯基，拉狄客，史米爾諾夫，維·史米爾諾夫，沙普洛

諾夫 (Spronov) (莫斯科十月革命的組織者)，普立奧布蘭會斯基，施列潑立亞考夫，史密加等。每個人有格柏烏陪往充軍地，到達當地後，不許工作，每月每人發生活費十五盧布。因為命令充軍的，計有中央委員會及格柏烏兩個機關，所以，上層的黨內要人，由前者發令，中下級的幹部則由格柏烏直接處分。拉狄客們，曾爲着這個不平等待遇，向中委會抗議，該會秘書拒絕他們，說：「你尙愚蠢地到中央委員會來幹嗎？如果你要平等待遇，那你就歸格柏烏掌管了」(註)。要知道這是史大林初期，對待異己者的手段。當時，他們尙懼怕無產階級，所以，用不平等處分優待十月革命的領袖！

最後充軍的，是托洛斯基。他的充軍地，是接近中國邊境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的維爾尼 (Vierny)。本來決定一月十六日出發，因為消息被莫斯科工人所知，追念托氏革命功績的工人，爭購票趕往波羅堡 (Perovo) 送行，依官場的報告

(註) 見托洛斯基着在俄羅斯之真正態度 (The Real Situation in Russia) 附錄英譯本三五

，這個小小車站，擁擠一萬個以上的工人。格柏烏恐怕滋事，臨時把托氏充軍的日期，改爲十八日。羣衆不相信這宗事，在站上等了四個鐘頭，一直至證實延期時，方各散去。翌日（十七日）格柏烏突然出現托氏的住宅，用武力強拉托氏出門，托夫人欲用電話報告友人，爲格柏烏禁止，托公子以抗議暴行的緣故，爲格柏烏打倒。結果托氏被拉入汽車內，用高速度駛至離莫斯科四十英里之弗斯托堡（Faustovo）站（同上）。在火車上，有武裝的兵士防守，至薩麻拉，不管托氏的抱病，又拉出來，轉送充軍地。

未充軍的反對派同志，所受的待遇是如此：「婦女與犯人娼妓同牢，男子與強盜們一起，不許接見。飯食粗劣，不許外物傳遞入內」（同上）。

後來，除托落斯基驅逐出境，維·史米爾諾夫病死外，大半投降，由充軍地向史大林投降，轟動當時的是「投降派三巨頭」——拉狄客，史密加，及普立奧布蘭曾斯基——的舉動。三巨頭的悔過書，內中歌功史大林路線的正確，及反對派路線的破產，正確與破產之論斷出發點，是「五年計劃上具體的數字」，數字證明史

大林的成功，所以可放棄一切其他條件。由出發點出發，產生了別的問題：第一罵托氏在資產階級的報紙上登文章；第二認黨的制度，十分滿意，又實際上負擔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第三，反對小組織；第四認爲國際「第三時期」的政策是全部對的，托氏把這個悔過書，稱爲「可憐的文件」。在可憐的文件中，他逐一答覆了拉狄客們。最值得一述的是指摘史大林歷史工廠的總經理耶魯斯拉夫斯基（Yaroslavsky）的造謠，說：「當史大林派誣反對派爲反革命的時候，我當全世界的朋友與仇敵之前說道：史大林派在造謠呀。我說：反對派將以最後的一點血，來保護十月革命。這一點，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他們在從我們的話中做他們的結論。耶魯斯拉夫斯基關於這一層聲稱道，我與張伯倫攜手，拉狄客們亦步亦趨地追縱在耶魯斯拉夫斯基之後，高叫着可憐的喉嚨。然事實已給了一個最好的證明了，全歐洲資產階級的政府，都拒絕了我的入境。不僅張伯倫，連麥克唐納都是一樣。蘇聯的外交官，爲保護史大林派的利益，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家及警察們締結聯盟來反對我，使我不能到歐洲任何國家中去。這才是真實的政治，比什麼可疑的數字都有更深刻的

意義。史大林與史脫來瑞孟（德國外交總長），與赫爾孟穆勃爾（德國內閣總理），與希爾賀丁（德國財長），與挪威的保守派，與法國資產階級的共和派，與麥克唐納及湯姆斯，與英國的好細等人同盟，結成統一戰線，來反對我，來反對反對派，這是無可爭論的事實，這是世界舞台上政治團結的象徵。誰如看到了這些事實，再和唱着耶魯斯拉夫斯基關於資產階級報紙事的論調，那末他祇能博得輕視，亦僅此而已。

（托著極左派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七八至七九頁），

此外，他尚宣稱三巨頭，「很久就已經是死了的人物了」。所以然被史大林用為宣傳的工具，那是打擊反對派。果然該派中，有許多人，接受拉狄客們的主張，繼續投降，這些事實，使耶魯斯拉夫斯基為文論述：「托洛斯基主義」的「垂亡」，托氏對這一點，十分有趣的答道：『三年前，甚至於四年前，早已說托洛斯基主義死了。後來又說牠毀滅。嗣後又得莫洛托夫不朽的名言，說托洛斯基主義蓋了「棺」，入了「墓」。而現在又開始說托洛斯基主義的垂亡與崩潰。而這是在死後，蓋棺後，進了坟墓！古諺道：誰要是被咒詛，誰活得更長久。這句俗諺，此

地正是相宜』(同上七三頁)

爲什麼，這些人會追隨拉狄客之後呢？依一九二七年耶魯斯拉夫斯基的統計，被開除的反對派有一萬二千人，一九二八年史大林在擴大會議中的演詞，說有一萬托洛斯基主義者被開除。從那時起，報紙上天天有開除「反對派餘孽」的消息。一共被驅逐出聯共的，總有二萬人左右。這些中間，有很多是年青與思想不成熟的分子，也有許多老朽的人物。他們自充軍後，所處的境況，十分可憐。家庭陷于窮窘，思想互相隔離，物質及精神兩受壓迫，不可避免地有分解的行爲。所以自三巨頭唱之于前，他們自然地追隨于後。

投降後的人物，過着怎樣的生活呢？他們不是重入黨的行政機關，就是獲得一個相當的位置，他們對於史大林，無論心裏怎樣不滿，外表上一致恭順。他們都立志開始做新的人，他們都努力刷新自己過去的行爲，無情地批評「托洛斯基主義」。爲史大林充當掃除「托洛斯基主義」最力的，是季諾維夫，卡米尼夫和拉狄客們。

所謂掃除「托洛斯基主義」的工作，範圍相當之廣。從黨的方面說，是剝削黨員的自由。當反沙皇時期，一九一七年兩個革命時期，後來克服白黨內亂與帝國主義干涉之二十枝軍隊在七千英里戰綫上作戰三年的時期，黨內的生活是富有生氣的。無論那個問題，都從最上層到最下層自由地討論着，自由地批評着。到史大林登台，負有「托洛斯基主義者」大牌的人，有充軍有祕密槍決的資格；贊成「托洛斯基主義」的人，有開除出黨，有受刑事壓迫的機會。反抗史大林官僚專政的革命者，老早被史大林揮于黨外，尙殘存黨內的，重新發揮他在沙皇時代祕密工作的情緒（這工作是擁護十月革命的遺產蘇聯，而反對騎在蘇聯無產階級頭上的史大林）。由反抗而投降的黨員，爲着失去氣節爲，着要對史大林表示忠誠，比史大林主義者還更堅決地批評「托洛斯基主義」，因爲只有這樣的批評，他們方得過着官僚的生活。於是整個布爾塞維克的黨，變爲歌頌史大林的軍樂隊，變爲史大林官僚統治的工具。

黨內如此，黨外的人民呢？當時由於數年來不斷戰爭的震動，使大眾感到休息

的必需。困于窮困與飢餓的工人，不惜支付任何代價，以使經濟復興。誰出來批評史大林的官僚統治，誰便被史大林派從工廠中拋出廠外，這個可怕的武器，減輕了工人對於政治的趣味。自然這個現象，不是當日蘇聯的特產，是任何大革命緊張過後，所不免之疲倦的反動，在這個疲倦反動期中，史大林的官僚機關，割去了羣衆的喉舌。

經過這兩個工作後，史大林何以尚需要掃除「托洛斯基主義」呢？因為，他們自己所勝利的，是目前，不是過去的歷史，自然也不是將來的歷史。將來的歷史尚沒有寫出來，縱使史大林是全能的神，也無能為力，但對於過去的，却有更改的段落。於是令他的忠實同志，督率投降派，日夜趕開歷史工廠，拼命製造可以增高史大林權威的「神話」，什麼，「史大林」(Stalin) 這個名字，是列甯賜與他的，因為他的個性似「史大林」(俄語義為鋼鐵)。什麼，終列甯一生，沒有衝突的同志，只有史大林一個人；在十月革命中，領導的不是托洛斯基，與被開除出去那些反對派的人物，而是史大林的「實際中心」(參閱蘇聯黨史)，與史大林的戰友伏羅希洛夫們

。這還不夠，另暗令全國的行政機關，把舊的可以冒犯史大林尊嚴的記錄著作，全部繳到克里姆林來。列寧的全集，開始塗改，凡與史大林的名譽，和史大林的主義，感有衝突的，全部掃除，所以，到今日托派根據列寧生時出版之全集的引用文，與史派根據列寧死後的三版引用文，多不相同。此外，尙把在圖書館，俱樂部，蘇維埃書店，學生與工人書架上，所有說着列寧與托洛斯基名字不可分離時日的語言，也都全部作爲掃除的對象。

於是托洛斯基的像片，從列寧像旁邊拿下來，換上史大林的。教科書中儘量用顏色在托氏的臉上裝塗。不幸這些工作從沒有一次給史大林的良心安靜過。當他心血來潮時，又馬上下令全國，指摘那些經濟學，社會學，歷史的問題等著作，有夾雜「托洛斯基主義的違禁品」。由每次指令的報告，許多學院的社會科學最重要的教椅，也多爲「托洛斯基主義者」，或「半托洛斯基主義者」所佔領，更糟糕的，當每次重新檢舉時，於檢舉之前，被史大林作爲檢舉托洛斯基主義的代理人，在他的身上，也都可以發現犯托洛斯基主義大罪的細胞。

舉幾個例，當列寧死時，爲着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的緣故，季諾維夫倉卒地寫成銷行全國的黨史。牠的唯一任務，是描寫由俄國社會民主黨到布爾塞維克專政止，有一個原則，是「善」與「惡」的鬥爭。他的代表者，是列寧與托洛斯基。這部書爲史大林在反托氏的鬥爭過程中，盡了一些功勞。可是，當一九二六年三巨頭的緣分完了時，史大林却以「托洛斯基主義違禁品」的名義，把季氏的著作列入禁書之林。其原因，不是爲着她不能爲史大林反對托洛斯基，是爲着在「善」的陣營中，季諾維夫給自己佔了一個便宜的地位，是爲着一點沒有關心到史大林站在歷史門外之良心上的痛苦。

於是，把史大林烟斗作爲火藥庫的耶魯斯拉夫斯基，被史氏指爲黨史的公正代表人。耶氏是監察委員會中的主角，是逮捕，開除，秘密，槍決反對派罪狀的製造者，那他應該能夠爲史大林的歷史良心，投着一服安靜的藥劑了。不幸得很，缺乏文學修養的他，儘管賣力依照史大林所領導之官僚集團的需要，去改寫歷史，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却又在他的細胞裏，發現「托洛斯基主義」的毒菌。這病症不算

小，所以，常常說「忙得不開交」的史大林，也親自出馬，對耶氏歷史工廠的製造品——黨史第四卷——給與嚴厲批判的論文。對於這一點，托氏在是史大林還是蘇維埃在削弱呢的文章中帶諷刺地說：「假使〔英國保守黨的首領〕包爾溫(Baldwin)，在他的一篇演說中，攻擊〔他的同志〕邱吉爾(W. Churchill)，同情於布爾塞維克主義，這在英國所引起的震驚，不會比史大林攻擊耶魯斯拉夫斯基，在蘇聯幫助「托洛斯基主義」爲更大」。史大林那一篇控告式的論文，成爲當時反對反對派的經典，成千成萬的人，都把他的頭鑽進蘇維埃的出版物中去搜索，結果，發現了每處都有「托洛斯基主義」無法逃避的違禁物。爲什麼，有這樣的現象呢？托洛斯基如此的解釋：「每一新社會層，當其興起當權時，總傾向於粉飾其自己的過去。因爲史大林官僚不像別的統治階級，不能在宗教的高位中找到援助，牠不得不創造其自己的歷史的神話。牠將那些抵抗牠的人的過去用黑色描寫，而用刷子將自己的過去刷成最光輝美麗的顏色。許多革命的領導角色的傳記，年年都有改變，依於其統治層的份子的變化及其野心的發生而決定。但是歷史的材料給予一些抵抗。

無論官式歷史家如何熱心，他們爲過去年代的檔案，定期刊物，舊日的論文，其中也有史大林自己的論文所遏阻，這是根本的壞的地方』（托著中譯本俄國革命與五年計劃一二四至一二五頁）。由思想上，如此的黑暗，可以給我們去了解在政治上，是呈着何種的情形。

第二 蘇維埃天國中的沙皇

自史大林打倒異己後，他的設施，以鞏固自己政權爲第一義。因爲要鞏固政權，便不能不剪除異己，無論自己的政敵是什麼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用「托羅斯基主義」的罪名，貼在他的額上，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已說得十分明白。

然而消極的充軍，祕密槍決，和積極地日夜趕開歷史工廠，從沒有一秒鐘給史大林的良心安逸過，所以他對付自己的政敵，唯一的手段，到最後來，只有造謠，只有胡說。這還不夠，他索性把良心上的痛苦，用虐待異己者的肉體去補償。要明白這一點，應從史大林的格柏烏，在充軍地對待政敵的方法說起。

二月革命前，俄羅斯革命者的住宅和墳墓，不是他的祖先給與的生長地，而是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十月革命後，真正布爾塞維克的住宅和墳地，還是前此光顧過的西伯利亞！這兩時代的西伯利亞，對於俄國革命家的生活，不僅有如此的聯繫，且有各別的方式。沙皇的警察，對於革命者的充軍，縱使不表同情，縱使不感痛心，而多少在工作上表現着鬆弛。因為，腐化與權威是沙俄統治的特徵。由之，大半十月革命的領袖，在他的生史中，常有從充軍地逃回的記錄。史大林的格柏烏呢？組織的嚴密，決非沙皇的內務部長可望其項背。格柏烏對於政敵的待遇，其方法與手段，也決非沙皇西伯利亞的警察所能為。所以，在史大林統治下，誰要想逃出充軍地，是非常困難的。

目前究竟在充軍地中，有若十的流犯，這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的。史大林的官場，為要粉飾自己天國的樂土，也祕不告人。充軍的人，不限于性別，不限于國籍。世界的共產主義者，在蘇聯內，如有觸犯史大林的威權，便有光臨的機會。為着這一點，在蘇聯受白麵包餵養的那些知識分子，和農奴對農奴主的忠誠一樣，把忠誠

的程度，表現于本國之通信的文字中。就中國來說，也有許多反對史大林官僚主義的青年，流落在西伯利亞的草原中，他們和各國革命者一樣地在做着苦工。他們的生活，依巨哥斯拉夫 (Jugoslav) 共黨政治局委員西利加 (Anton Ciliga) 博士的報告，是如此：『說到中國人與其他「東方人」，現在蘇維埃統治者，對於他們的待遇，比對待「白種人」更加殘忍。他們一般地是不承認為政治犯的。例如：屬於前莫斯科中山大學反對派的學生，不管他們是運往最壞的充軍地或是拘禁于集中營，和運囚犯一樣……』。

這位西里加博士為什麼會知道這宗事呢？因為他以本國黨的代表名義，于一九二六年駐蘇，後來，爲着在政治上的意見，與史大林相反，被格柏烏囚于牢獄，繫于列甯格勒的集中營，充軍于維肯尼·烏拉爾斯克 (Verkhne Ural'sk)，遭着同一運命的，還有巨哥斯拉夫著名工會領袖狄茲 (Deditch) 和前巨哥斯拉夫黨中委德拉焦亦茲 (Dragutich)。他們住在冰冷的舊哥薩克軍營中，穿的是破衣，吃的是墨麵包和水漿，最闊氣的午餐，是罕見的有臭味的魚與半腐敗的肉罐頭。一年

只有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兩天，見到不足填滿飢餓慾的白麵包。不滿意這個虐待政治犯時常絕食。「在布爾塞維克，列甯派中的女同志，如列娜·登尼羅維茨（Lena Danilovich），用割斷血管抗議這種禽獸似的待遇。這個統治的產物，是用大批同志的不幸去證明的」。還有「伊凡諾娃（Marusia Ivanova），是全西伯利亞內戰與祕密反對柯爾察克（Kolchak）白軍領袖時代，著名的女鬥士」，「也遭嚴重身體上的損害」。另有一到名格拉奕夫（Andrey Grayev），「經格柏烏在牢中獸畜似的處罰，到一九三〇年二月雙目失明」。

過着這種豬狗不如的生活的，依西利加博士的報告書，都是下列政黨的人：左派社會革命黨，季諾維夫派，托洛斯基派，工人民主反對派，左派共產主義者同盟等等，這些人雖然在充軍地，在集中營，在牢獄中，還是和沙皇時代一樣地，過着政治的日常生活。他們依自己的派別集成自己的政黨，把自己的意見，手抄成的小冊子，祕密傳佈。他們不同的政治派別，在聚合時，也互相堅持自己的意見，從事辯論。由辯論而決裂，也決不因彼此損失自由，而可以避免。到一九三三至三五年

，經過的事實，證明過去的理論，許多小派別，與托派一時在牢獄中在充軍地中統一起來。這個政治生活，依西利加經驗的估計，在全蘇聯沉寂的境況中，「牢獄變爲自由社會學探究的唯一所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八日英文新聞爭週刊)

一九三三年五月，西氏充軍期滿，應該可以釋放，可是格柏烏忽傳奉命令，強把他們裝在汽車上送往別的充軍地。他的同志地狄茲和杜拉焦奕茲兩人中途分開，當西利加好不容易離蘇時，還在西伯利亞對饑餓與危亡過着搏戰。經一日汽車的路程，他被安置在有五十至八十個，屬於社會革命黨，季諾維夫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與幾個共產主義者之契力亞平斯克 (Chelyabinsk) 的政治牢獄中。因爲不滿于惡劣待遇的抗議，他被當獄格柏烏長官趙比尼斯 (Dupnis)，送往當地的軍隊地牢中。於是他在這「潮濕，寒冷與黑暗的世界裏」，對豆粒似的電光，過着三個月的時間。他決定用自己的血，去染史大林天國的布幔，開始絕食。過了十天晚上忽有許多格柏烏走進來，他認識中間有叫做安杜勒奕夫 (Andreyev) 的，是一個著名「迫害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專家」，另有一個日稱爲檢察官，係

波蘭工人出身。他對後者有沒有抱着一些希望呢？沒有的，因為「波蘭重要的五十二個共產主義者，未經審判，早用畢爾斯基主義者，背叛與賣國的罪名槍決了」。剩下來，是「史大林化的波蘭工人」。開始是趙比尼斯發令，接着安杜勒奕夫說：「公民西利加，我有下的命令，格柏烏與蘇聯兩中央機關。不准你離開蘇聯……由格柏烏中央部決定延長你徒刑兩年……格柏烏對你的絕食，認為不當，自明天起用人工方法喂你」。西利加博士冷靜地答道：「絕食與人工喂飲，早算是次要的問題。……若使是必需就讓我自殺，把我的死亡作為宣示給外國無產階級的代價」。安杜勒奕夫冷笑道：「一個人決心自殺，並不算得一回事」。話雖這樣說，却允許為西利加轉達蘇聯中委會及格柏烏長官的抗議。對抗議文的覆電是如此：「巨哥斯拉夫共黨的政治局，已決議令格柏烏延長你的刑徒兩年。該議決書另行轉達」。西利加博士，對這個處分理直氣壯重行抗議說：「這不是我的政治局。這是你們的傀儡。牠的議決案，不能束縛我。我不承認這個政治局。我不屬於你們任何的共產黨，我也沒有想隸屬於牠們的黨籍。所以，我不承認牠們的紀律，不受牠的指揮」。我們

要知道西利加博士這個行爲，是違反史大林天國統治規律最無可赦的罪惡，因爲內中尙含有非奴隸者的反抗性。給這個反抗性的報酬，是四日後，再延長徒刑一年，並且決定充軍於伊爾庫次克（Irkutsk）。

在西伯利亞充軍地中，許多老布黨，與別的地方一樣。他們除秘密政治的生活外，還須做苦工。苦工的代價，僅僅是裝滿肚子。剩下的時間，于格柏烏視綫之外，手寫他的政治意見。他們在休息地或在牢獄中，討論到世界大勢，估計到過去革命的發展，成功的原因，與失敗的緣故，自然他們應該也論述到史大林的勝利。

在那些人中，屬於反對派者（由上，我們知道牠不過是蘇聯許多反史大林的一個派別），史大林官場願意拿出來宣傳的，都是變節與投降的分子。自然他們中間，也有「餓死事小變節事大」的好漢。依該派的報告，目前還在史大林鐵蹄下過着掙扎的人，舉著名的下述三個領袖爲例，由之可以窺知他們的生活狀況：

第一是潘可拉托夫（Vassil Feodorovich Pankratov），凡是讀過俄國革命史的人，都知道他是婆羅的艦隊的領導者，他參加過克倫斯他（Kronstadt）的暴動，

又是該蘇維埃阿克倫斯基的代表，在內戰中是著名的切卡（Cheka）和格柏烏。一九二三年參加反對派，外高加索格柏烏的首領，一九二八年被捕，判三年徒刑，因為在充軍地中，倔強的性格，被史大林的官僚，加刑兩年。一九三三年期滿釋放住居奧蘭堡（Orenburg），得與其妻（她不是黨員，所以然也被充軍，為着是犯人妻子）會見。自基洛夫被刺，他和成千成萬的無辜者一樣，又復成為牢獄的顧客。四五月後，方知道他又在烏拉爾斯克的獄中，用肉體抵抗史大林刑罰的代價，是五年徒刑。除他在信仰上不信史大林這人為的上帝外，他還有什麼罪呢？

另一個是布多洛夫（Mikhail Bodrov），他是莫斯科的工人，參加內戰，組織紅軍，一九二八年托洛斯基放逐于亞爾馬·亞塔（Alma Ata）時，反對派的組織，派他到該地做交通的工作。他喬裝農民，完成他的艱苦任務。約一年被捕，坐幾月獄充軍。期滿出獄，因為不更改他的信仰，又復入獄。在烏拉爾斯克渡了三年頭（一九三一至三四），後來為當地史大林的集中營湊熱鬧。

又有一個喬治亞老布黨唐巴茲（Lado Dombadze）是內戰著名的人物，自革

命成功後成爲史大林牢獄的食客。一九三四年，他的兩臂爲着格柏鳥的恩寵，麻木不靈。在牢裏穿衣及飯食，都由他的同志代勞。雖然這是革命者從同志身上得到的報酬，却背反史大林天國中做人的人性，一九三六年三月，特地把他遷往沒有一個同志的薩拉坡 (Sarapue) 充軍地，至今生死不明！

以上是典型反史大林的人物，自然還有許多的無名英雄。他們爲的是什麼呢？在革命期中，他們站在最前綫上，打過白黨，革命後，他們爲什麼不和拉狄客一樣在史大林之下過着奴狗的生活，他們爲什麼還要坐牢，坐自己手創無產階級國家的牢呢？這却不是可以用史大林官場的報告能夠解釋的。

另外，也有不少的人物爲着他的名字已與世界革命運動史，聯繫一起，所以賴國際著作家或工人的呼號，離開新沙皇史大林的牢獄，而得重見天日。其中著名的，是塞爾支 (Victor Serge)。這位俄國革命之一年 (The Year On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的作者，一九三三年被捕，除反對放棄他的革命觀點，與不滿史大林的政策外，不能在他的行爲中，發現一些違反蘇維埃法律的成分，但他却支付史

大林牢獄以三年的代價。在獄裏他不能與外界通信，病妻和幼子的生活，則靠在法國出版物的版稅去維持。史大林官場希望他投降，但偉大革命者鐵的意志，終不能用格柏烏的虐待去侵服。一九三六年，法國著作家——自然如出賣靈魂給史大林，已故墮落巴比塞這一類的天生奴才，不會參加的——們，成立援助塞爾支委員會，這一個鐵錘壓在史大林的頭上，不得不于當年四月一日，把他釋放出來。可是自由的他，不能帶一冊書一張字條離開新沙皇史大林的天國。

處理十月革者命的態度，是如上所述。對待反革命的階級呢？史大林比老佛爺還要慈悲。在今日國際舞台上，他可以和任何統治者談聯合戰綫。可以和帝國主義強盜，在會自稱爲「強盜分贓」機關的國聯裏大飲香檳，決不能對托羅斯基派說話。爲什麼？這一派的人是「賣國」是地球以外「帝國主義的先鋒隊」，所以史大林把他們推入十八重地獄裏。至于沙皇時代的貴族，資本家及富農呢？這些人們，在史大林眼中是比托派有靈魂，可以走進史大林的天國。所以，在一九三六年初，給這些人的子弟，以平等教育的機會！

自然，我們不應驚異這宗事，因為史大林統治下的教育，應為那些人而設的。沙皇時代的教育，是培養奴性十足的官吏，工程師，醫生，在束縛鐵鍊下，不許受教者以任何的自由，所以一九一八年十月蘇維埃國家，宣傳教育的宗旨是「自由的紀律互助的精神，根據平等原則的自治……換句話說，培養一個我們所需要的公民」。目前史大林的教育原則，把列甯所手訂的，一律除撤，依一九三五年九月三日人民委員會的議決案，命令學生受嚴格的管束，對師長有禮，檢查日記，用分數為處分與賞罰的標準。

對以前的貴族們，除去限制受教育的機會；對於勞動者的子弟呢？依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蘇維埃工聯（Trud）的報告，在金屬勞動者工會的執委員中，有一工人的演詞，報告給我們：「自一九一一年就服務該工廠工人孟曾狄諾夫（Mezudinov）的兒子，不能入學校。他們沒有衣服也沒有靴」。史大林主義者，兩三年以前，早已宣稱一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實現，史大林的統治，已走進社會主義的階段，何以尚有如孟曾狄諾夫的家族被遺留在飢餓的環境中呢？何以他的兒子，

不能接受與貴族們同等的待遇呢？只有一句話，蘇聯不是如孟曾狄諾夫們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史大林官僚的專政。

因為史大林的官僚專政，是騎在無產階級的頭上，所以，他們對於該階級的後繼者，不能給與政治上的自覺，也爲着這個原因，史大林廢除共產主義青年團（Komsomols）的政治任務，一九三六年三月末該團第十次大會，決定改爲無黨派，無階級的文化團體。

上面所舉的各種事實，托洛斯基在他的史大林還是蘇維埃在削弱呢論文中，曾作下的解釋：『幹成功了一革命，在最困難的環境中領導和保衛過革命的一層人，當革命的手所做的工作已達於完成時，突然變成「一反革命」層，而革命後數年，一新的真正革命層到來代替牠的位置，這樣的事在歷史上還未發生過，所發生的恰是相反的事實。在一切大革命中都看得到的，即當勝利已得到和勝利產生了一新的統治層有其自己的利益與要求，當這一較穩健層，反映對於「法律與秩序」的要求，將第一批的革命家推開時，她永久攻擊其先輩缺乏革命性。從革命中產生的最

保守的官僚除了宣告牠的反對者是穩健的，半途的和甚至反革命的，除了這方法以外，不能用別的方法辯護其得到政權的權利。史大林的方法並沒有呈現出一點新的，然而我們不要以為史大林是自覺地剽竊別人。也沒有很多歷史知識以供剽竊。他僅僅是服從他自己的形勢之邏輯而已。

然而我們于托氏的解釋之外，應有一個補充，固然史大林所走的途徑，並不是新鮮，但他的歷史條件，却與任何人不同。無論那個統治者，他只具政治的力量，從沒有能夠于該力量之外，再操握整個國家的經濟勢力。有的歷史上只有史大林。史大林能夠把全國政治與經濟兩個勢力，握在自己手掌中。那爲着他所統治的國家，是取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因此，任何與統治者思想不同的人，在蘇聯之外，可以生存，只要他肯取消了實踐的活動，潛伏在書齋中；只要他尚有一技之長，他都可逍遙權力之外。如這些人生活在史大林的天國裏，那他們必然地，要成爲牢獄的食客；充軍地的光顧者。除非他是無名小卒，或史大林主義者，本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否則，史派一定請他表示政見，命令他們寫有利于自己政治的論文。誰敢

拒絕，縱不入獄，而運用經濟的力量，行政教育機關不準你光臨，工廠以及其他生產機關，拒絕你的參加，也活活餓死。爲着這個原因，我們在蘇聯中見到兩個現象：第一，史大林主義者之奴顏厚臉，表現於文字上的，爲一切時代冠，其歌功頌德的拍馬文章，亦爲有史以來之知識分子冠。所不同的，是用革命的口頭禪與馬克思列寧的符咒，掩遮自己的赤裸面目。第二，對於知識分子的迫害侮辱，和文字獄的方式，也打破任何專制國家的記錄。專制的魔王，只能摧殘有反抗性文人的肉體，不能奴使他的靈魂，蘇維埃的新沙皇——史大林，那就具有兩種本領，以最下賤的拉狄客爲例，當被格柏烏拉往允軍地時，是受着肉體上的虐待；投降後，令他寫着「史大林新史學」這一類文章時，是踐踏他的靈魂，又由于上述兩個情況的存在，我們見不少著名學者可悲的下場。

以里薩諾夫（Riazanov）爲例。他的大名，凡是讀過一本馬克思著作的人，無不知之。他一生對於馬恩兩人文獻的註釋，搜集，刊行與發揚的功績，載在他以馬恩列學院院長名義校訂的書籍中。我們應如何地尊敬這位老馬克思的門徒呢？但

史大林爲着演說「一國社會主義」時，里氏插口的非難（見論反對派）；爲着他不能在歷史工廠中爲史大林的良心找到休息所；爲着他是托落斯基在辦我們的話時的戰友；爲着史大林的徒子要奪他的位置；遂把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與以超越沙皇手段的待遇。事情的經過是如此：里氏勤於搜集馬恩二人的文件成爲歐洲文化古董的好主顧。一日在柏林中，發現一張恩格斯罵考茨基的信，如果把這封信公佈，則對於考氏的政治上名譽有重大關係，且可影響于他所領導的第二國際。可是有道德教養的古董，却附有須在考氏死後方可公佈的條件。里氏以該條件內容重大，特商之于聯共的政治局，得列甯們同意，結果以高價把這封信買回來。到史大林要侮辱里氏時，便令他的門徒，在黨中控告他是同情于考茨基的人，是屬於反革命的人，唯一證據，是不公佈那封信。一九三一年開除他黨籍，免院長職，這還不夠，再把他和「孟塞維克審判」（Menshevik Trial）的案件混在一起，由國家檢察官起訴他與反革命的工程師拉姆真（Ramzin）相勾結，有破壞生產力的行爲，判決充軍。結果以七十餘歲的高齡，死于薩拉托夫（Saratov）由里薩諾夫一生的言行，只有

狗纔相信，這位恩格斯的學生，會幹勾結帝國主義的勾當。他的死簡直是一條毒箭射進每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胸膛。

然而，這是史大林給與活生生馬克思主義者的禮物，對於死者呢？他也不吝惜。以包克羅夫司基（Pokrovsky）爲例。這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家，就不說在他的俄羅斯簡史（Brief History of Russia）中得列甯的稱贊，而他生時，對於「托洛斯基主義」鬥爭的賣力，死後也不能取得史大林的歡心。因爲包氏的歷史作品，尙含有一些可以使史大林良心感到不甯的內容，所以，在十月革命後十九年（一九二六），在自稱爲已進入社會主義時代的期間，還忙了史大林，下令他的第一等心腹沙唐諾夫（Zhdanov），組一十二人委員會去清理歷史！接着真理報于一月二十七日，宣稱該委員會的任務，是肅清包氏的史學，因爲「包克羅夫司基學派的有害傳統，在蘇聯歷史境域中，還未肅清」。肅清的範圍，依聯共與蘇聯人民委員會主持人史大林與草洛托夫的命令，是改寫教科書。爲什麼要這樣做，因爲在過去反托洛斯基主義的歷史健將包氏監編下的史書，還含有「托洛斯基主義」的成份！誰來

做肅清的工作？是史大林忠實的「同志」拉狄客（註）和布哈林們！

此外，還有著名經濟學家盧濱，哲學家傑波林，也受過史大林的侮辱。這些人縱使在思想上有錯誤的，但他們究竟是學者，何必把「反革命」加在他們的頭上。就說他們過去是孟塞維克，但馬丁諾夫呢？國家檢察官維興斯基呢？史大林攻擊他們，甚至剝奪他們的生活權，但他們不肯做下賤的事業，這些人在這樣環境中，不愧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人格，在目前比那用腦袋歌頌史大林的拉狄客，把史大林在哲學上列一個階級的布哈林，高出萬倍！

第二 基洛夫血的代價

在上述蘇維埃新沙皇——史大林統治下的蘇聯，逐漸地失去革命的朝氣。腐化的官僚，盤據要津，用革命的詞句，去掩蔽他的醜態，稍為愛惜十月革命歷史的人

（註）關於包比學說被批判之點，這裏爲着篇幅的關係，不能詳述，請讀者詳讀包比作品及十二人委員會的意見書，或參閱中學新動向。

，決不會在那裏奴顏婢膝地雖生猶死而苟活。革命的先鋒隊，雖成千成萬地被充軍被槍決，而由于官僚錯誤的指揮，所展開內部經濟的矛盾，新的鬥士——反官僚專政的鬥士，卻比例于充軍比例于槍決，層層地湧現出來。可是，這些鬥士培養的速率，總不及由官僚腐化而生之反動細菌的數量，於是勾結帝國主義企圖推翻十月革命遺產者的動作也不斷地蠕動於史大林的脚下！

史大林的政權，就靠殺左和右而維持。在殺戮過程中，另有一些人供爲史大林流血的祭品。他們就是季諾維夫及其同志。

季諾維夫是列甯的戰友，第三國際的主席；卡米尼夫是列甯生前死後期間中，總攬政務之政治局的負責人。他倆有許多被列甯稱贊過的優點。這些優點，使其一生中，在某些時期，成爲國際著名的人物。但也有許多弱點，這些弱點，奠定他倆後日可悲的運命。最重要的弱點，是動搖兩個字。

季諾維夫們所以然會動搖，雖半由于他們的性格，而理論分析上的模糊，與史大林中派政權搖擺不定的性質，也構成爲另一半的原因。所以，當史大林的統治右

傾時，目觀不滿右傾羣衆情緒的他們，起而反對史大林；這也就是說他們開始左傾；經不起史大林官僚手段的打擊，他們缺乏勇氣的性格，逐漸代替以前進攻的態度。這也就是說，他們由左傾後轉到懷疑不決；到史大林向左盤旋，他們的頭腦，一時糊塗起來，以爲自己失去鬥爭的根據，遂再轉一個角度，那就是投降。季諾維夫們，終其一生，在這個公式中打滾着。

一九二七年鬥爭失敗後的季諾維夫們，又成爲史大林反「托洛斯基主義」的先鋒。史大林並不因他們如此的忠誠，而忘却舊怨，更不因其用文字來恭維自己，而任其參加政治的機關；不，官僚們是把他們放在卑賤眼光下過着生活。受史大林派虐待的他們，在經不起虐待的手段時，又掀開過去革命者的情緒，起而反對被他們曾自認過的主人。到一九三二年十月，史大林對付這個反抗，再開除他們的黨籍，名義是參加魯丁（Ryutin）的富農反革命運動，是企圖推翻蘇維埃統治，恢復資本主義的制度。將要執行充軍時，季諾維夫們在一九三三年又作第二次的投降，史大林和玩猴子似的，接受他們的投降，允許於第十七次黨大會前入黨。

這個手段，雖然是適合于季諾維夫們的性格，也可以說，是官僚的唯一拿手好戲。當時史大林不就把季諾維夫們作爲鞏固自己政權的祭禮，不是他沒有屠宰的權力，是爲着還沒有這樣的需要。先把他們的弱點——動搖的弱點，更充分地暴露于羣衆的面前，給未成熟的羣衆，失去同情與信仰，希望在這一剎那間，官僚自己的信望，代替季諾維夫們對自己鬥爭時在羣衆腦中的位置。無需說，官僚取得羣衆的信仰，也只能用這樣的方法。

可是，季諾維夫們的墮落，並不能證實史大林的高超，因爲左的勢力的衰頹，同時必然是右的勢力的抬頭，看下的事實：

善罵季諾維夫派的蘇聯駐英大使馬夷斯基 (Maisky)，是一個孟塞維克右派，一九一八年在烏拉爾區白黨政府裏，任可驕傲布爾塞維克的總長。這政府，是建立于柯爾察克（白軍在西伯利亞的總司令）槍尖之上的。到柯氏兵敗身亡，馬夷斯基又走進蘇維埃來。列甯和托洛斯基，對他非常看不起，但善于逢迎的他，却是史大林安慰自己良心所不可缺少的小丑。因之，他在蘇維埃中的地位，比例于左派的退

落而增高，每次控告季諾維夫派與托洛斯基派，他並不吝惜他的氣力，因為，他是做過帝國主義政府的總長呵！

另一個是駐美大使脫洛陽夫斯基 (Trojanovskiy)。年青時，就加入布派，到世界大戰時，變為愛國主義者。一九一七年，是優秀的孟塞維克，十月革命時是孟派的中委。這還不足表示他的卓越，最足給我們知道的，是十月革命成功後，他是暗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運動的健將。只在左派反對派下台，他方信任史大林，願意為史氏在國外充當監督反蘇維埃新沙皇運動的先鋒。

又有一個是法國大使波旦金 (Potemkin)，當十月革命時，他是資產階級的歷史教授，革命後，纔加入布黨。前任駐德大使肯屈克 (Kinchuk)，是老孟塞維克，當十月暴動時，他是反革命之「拯救祖國與革命的莫斯科委員會」的負責人，與任人民財政委員右派社會革命黨格林科，同為該委員會的健將。繼肯屈克到柏林去的蘇利支 (Suris)，是二月革命後，史大林欲與之合作孟塞維克齊怯采的政治祕書，到蘇維埃政權穩定後，方願意站在史大林的旗下。

以上著名外交家的面容，並不足使我們驚異，因為同情于反對派之外交家，如倍克道夫斯基，米脫利也夫斯基，阿加倍可夫們在國外的行動，教訓史大林只有，用上述那些人，是安穩的；無需說，在和帝國主義建立「不可分割和平」的時期，上述幾位當過帝國主義老爺的走卒的人，是史大林最妥當的同志。

在蘇聯國內我們如果熟悉俄國革命史，一定會認識幾個史大林的忠實同志。第一，我們應該介紹，曾被塔斯社介紹給全世界之蘇維埃金礦業偉大的指導者，克達勃洛夫斯基工程師。當時的電報，特別努力抬高他的地位，說克氏是一九〇三年入黨的老布爾塞維克，可惜牠不說一九〇五年以後的工作。二月革命前，他是兩個兵工廠的政府督察員，革命時是貿易部的委員，並且是反對五金工人工會鬥爭的積極參加者。一九一七年五月，他宣佈史大林念念不忘的老師——列甯，是德國的偵探！十月革命後，他負擔技術工作，列甯們從沒有投視綫到他的身上。現在，是共黨中委，是最好的史大林主義者。

另一個，是我們所熟知之真理報的主編人之一，查斯拉斯基 (Zaslavsky)。

他本是右派猶太同盟中的孟塞維克，後來變為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一九一七年，他是努力宣傳列甯與托洛斯基係德國代理人的牧師，就在列甯一九一七年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一句結論：「查斯拉夫斯基以及其他像他的那些痞子們！」內戰時，他是基也夫白軍刊物的記者，一九二三年走進史大林的家中——那裏就是被列甯罵過「痞子們」的最好俱樂部。現在是典型的史大林主義者。

自然，我們不能夠一個個地把史大林的同志的出身，介紹出來。可是，這些例子却足給我們說明一回事，十月革命時代的鬥士，變為階下囚；革命前後反動的人物，成為史大林的座上客。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已被恐怖，諂媚與陰謀所驅逐，代替以「痞子們」所需要的史大林主義。一切的一切，證明列甯夫人參加列寧格勒反對派時的話：「幸好列甯早死，不然會被不肖門徒放在監獄裏」。蘇維埃的新沙皇史大林，不能把活生生的列甯，放在牢裏；卻能夠把死的列甯，關在陵墓中，却能夠把列甯的靈魂，釘在十字架的上面！

官僚彈冠相慶，給與史大林的滿足，是超過他所應享受之恭維與禮拜。自一九

三〇年起，在史大林統治下，有一個現象，就是史大林的偶像，變爲耶穌死後唯一的基督。盲目的吹牛和拍馬，與格柏烏的恐怖，必然地復活了早已埋在羅曼諾夫陵墓裏虛無黨之個人英雄主義的精神。果然一九三四年，發生基洛夫（Киров）被刺的事件。

基洛夫是什麼人呢？他一九〇四年入黨，後來任托姆斯克黨委，往來于伊爾庫次克和海參威間從事黨的工作。當內戰時，參加軍事工作。一九二二年進爲中委，一九二三年任亞西爾巴揚（Azorbayan）黨書記，隸屬史大林的小組織。一九二六年，史大林與季諾維夫們鬥爭時，任爲季氏根深蒂固之列甯格勒區書記，負責滅季諾維夫小組的任務。一九三〇年，任政治局委員，係史大林的左右手。當他被刺的消息公佈時，最初官場的報告，是從波蘭及羅馬尼亞邊境移來白黨活動的成績。到十二月十七日，官場的報告，說兇手尼古拉伊夫（Nicolaev）是一九二六年列甯格勒季諾維夫的同志。又十日，塔斯社宣佈，刺殺基洛夫的恐怖黨，是屬季諾維夫派組織，牠的目的爲反蘇維埃。全國格柏烏在獵着恐怖的野獸，成千成萬的人，陸

續入獄，充軍期滿享受自由不久的人，也以嫌疑的緣故，不能倖免。當日依該通訊社報告，被捕的大人物除季諾維夫與卡米尼夫外，還有下列幾個人。

一、蘇魯茨基 (Zalutsky)，係工人出身的老布爾塞維克，前中委，前列甯格勒黨書記，第一次清黨委員會主席。

二、伊夫杜奇莫夫 (Ivokinov)，係工人出身的老布爾塞維克，前中委及組織局委員，列甯格勒蘇維埃諸領袖之一。列甯葬儀時，黨的代表演說人，基洛夫被刺時中央委員。

三、西沃杜洛夫 (Fodorov)，係工人出身的老布爾塞維克，前中委，十月革命時蘇維埃工部的主席。

四、薩發洛夫 (Safarov) 老黨員，與列甯同坐秘密火車返國，前中央委員，列甯格勒真理報的總編輯。

五、巴卡奕夫，工人出身的老布爾塞維克，彼得格勒切卡長官，列甯生前死後中委及監察委員，內戰時有功者之一。

六、尚有較不著名之沙洛夫 (S.arov)，發奕維洛維支 (Faivilovich)，凡爾丁 (Vardin)，哥芝雷 (Gorchenin)，波拉克 (Boulak)，哥爾提克 (Guerzik)，柯斯丁娜 (Kosina) 七人，也都是老黨員，在沙皇勢力下的老鬥士，內戰期間的戰將，革命成功後，各在蘇維埃及黨內佔重要位置。依當時真理報的說明，上述諸人，都是企圖以恐怖手段，恢復資本主義的。就不說，按照官場的報告，凶手尼古拉奕夫的身分，于數天之內，由白黨的刺客，一變為季諾維夫派；因為是季氏的門徒，所以牽涉到季諾維夫們的身上。到今日我們已知當時被祕密逮捕的，並不只上述十五人，還有一大批老布爾塞維克。

在那些老布黨之中，我們首先應指出的，是史米爾諾夫，這位在黨內的生活佔四十年的革命者，是由內戰期中，著名第五軍團的長官，西北區布黨的首領，賴他的天才，在東方組織並指導革命，獲得「西伯利亞列寧」的綽號，歷任中委多年，並負過發展郵電人民委員的責任。其次是凡甘甯 (Vuguzhsk Ter-Vuganian)，亦為老布黨，亞曼尼亞共黨及革命首領，有關於民族問題及其他馬克思主義的著作

，在列甯指導之下創立黨的著名刊物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Pod Znameniem Marx isma）。第二是莫拉茨柯夫斯基（Sergii Mrachkosky），當他生時，他的父親以參加烏拉爾工人革命運動的緣故入獄，到十五歲（比史大林還要早了！）就參加革命工作，自一九〇五起歷任布黨委員，當沙皇統治時，常常被捕。一九一八年，他排除白色恐怖在烏拉爾區指揮工人暴動，組織工人軍隊，橫衝柯爾察克軍隊，到烏拉爾奠定，他任該軍區長官。一九二四年，因為他贊助托洛斯基被史大林免職。第四是杜勒塞爾（Yofim Dreitsar），前托洛斯基的贊助者，內戰期中著名的英雄，兩次以功授紅星獎章。到與反對派鬥爭發生時，被史大林充軍，曾在充軍地與六十二個同志，以抗議虐待絕食至幾瀕于死，後終投降於史大林。

以上各人，後來成爲第一次公判的演員，到今日都血染史大林的歷史祭壇。還有一批中，是充任第二次公判的主角。內有蘇柯爾尼可夫（Georgy Sokolnikov）在他四十八年一生中，有三十年是服務于布黨，大戰期中屬我們的話派，一九一七年革命時，莫斯科的組織者，真理報及其他布黨機關報的編輯人。第六次黨大會，被

舉爲中委，銀行局局長。一九一八年三月任對德議和代表，內戰時著名軍事領袖。一九二一至二六任財政人民委員，創立茨爾萬尼茲(Cherwonetz)，奠定蘇聯的貨幣制度。前駐英大使，及外交次長。在黨爭中，一九二五年參加「新反對派」，一九二六至二七屬「聯合反對派」，一九二七脫離該派，投降于史大林。

第二位是施列潑立亞考夫，在黨內歷史三十一年，沙皇統治時著名革命家之一，總其一生，計被捕十四次，充軍五次，一九一七年莫斯科暴動組織者，內戰期中前綫有卓功的指揮官，中央委員，並在列甯指導下任黨書記，一九二七年以「托落斯基主義者」罪名開除黨籍，派往美國指導亞姆托落(Amforg)，投降史大林後任中東路長官。

第三位是畢亞塔考夫，在黨內有二十年歷史，列甯遺囑上被提及之著名經濟學家。一九一八年任烏克蘭首次人民委員長，中委，國民經濟最高會議負責人。一九二〇至二二間爲托派同情者。一九二六加入「聯合反對派」。十五次黨大會被開除黨籍。翌年投降史大林，任國家銀行主席，及重工業委員會委員。他在政治鬥爭上

，動搖性與季諾維夫們等，但行動更劣于季氏一籌。曾被托氏罵為「有官做便有道
理」的投降派主角之一。

另有一大批人物我們不必逐一把他們的名字寫述出來。可是在這次流的人物中，我們却不能不知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家弗力得蘭 (Fridland) 與西埃德 (Seidel)。巧克力 (Chocolate) 作家塔拉梭·盧狄昂諾夫 (Tarasso, -Rodionov) 法國革命期中之婦女 (Wome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的作家施列潑立亞考娃 (Galina Serobriakova)，她的被捕，並不是由于她反對史大林或有損史大林威權的活動，是為着她是犯人施列潑立亞考夫的老婆。

所有犯人，是陸續在各地逮捕的，如果我們注意自基洛夫被刺後真理報的記錄，這個新聞幾乎不間斷地佔着牠的篇幅。而且，當「發現」(自然這是史大林的發現) 喬治亞，亞曼尼亞各地的反革命「托落托斯基恐怖黨」時，連史大林的堂兄弟，也為阿兄牢獄的食客。

細細讀被捕者的生活和歷史，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在被捕的人名中，

在後日受公判的人名中，沒有一個是前此的富農，製造業家，銀行家保皇黨，白軍，內戰期中的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員，無政府黨員，以及其他反蘇維埃反俄國革命的人，不折不扣地，一個都沒有！除後面所說的格柏烏扮裝托落斯基的專使外，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列甯的戰友，老布爾塞維克。其次，我們還要注意的，被捕者的罪名，都是參加恐怖的組織，或指揮恐怖；都是基洛夫直接或間接之血的購買者，和史大林加干諾維赤以及其他天國中親貴大臣之性命的追獵者。而恐怖手段及其結果，是他們生前所目擊的，又是他們與民意黨們行動不同而可以成功的原因。何以他們會這樣地健忘呢？在這裏我們應述恐怖主義產生的客觀條件。

沒有一個國家革命史中，有如沙俄時代之充滿轟轟烈烈的英雄。這些人們，都奮不顧身地用炸彈和白刃購買沙皇及其官吏的血肉。這些人們可歌可泣的舉動，充塞于馬克思主義抬頭的俄國史中。最著名的有一八八一年格林伊維茨基(Grinevitski)之炸亞歷山大二世，有後來列甯長兄烏里亞諾夫之刺亞歷山大三世。無論成功與失敗，他們都成爲斷頭台下的死鬼。他們的死，絲毫不能實現他們所理想的目的。

。去了一個舊沙皇，又來了一個新的更加專制的沙皇，死了一個沙皇的官吏，又來了一個更殘暴的「陛下忠臣」。這些事實教訓了繼承者，所以，當傑列哈諾夫們的時代開始時，沒有一個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成爲反恐怖主義的人。就不說在列甯著作中，充滿排斥恐怖手段的文字，只要多讀一本書的人，也會明白，世界上有一冊馬克思主義者中著名反恐怖主義的作品，叫做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牠的作者，不是別人，而是史大林天才作品——公判書——所幻想的主角，托洛斯基。

半世紀之前，俄羅斯的歷史——充滿恐怖主義的歷史，已成爲研究完了的對象。這對象告訴人們，恐怖主義不是從天而來，是有一個社會的客觀的原因。人誰不貪生而惡死？何以，一個統治時期中，有貪死而畏生的人？這全是沙皇專制的產物，在那裏人民沒有民主自由，只有光顧西伯利亞的自由。極端的壓迫，產生壓迫的反動，這反動就是恐怖。

所以尼古拉奕夫，刺殺基洛夫的責任，不專是由反革命者去負擔，史大林的專制也要負擔一大部份。黨內沒有民主，人民戰慄于格柏烏的暴橫，充軍成爲政治的

日程，祕密逮捕和槍決，成爲蘇維埃官僚的家常便飯。這些環境，都是恐怖主義的培養劑。

其次，促成恐怖的另一個原因是史大林教主的企圖。在今日，史大林成爲至高無上的偶像，成爲全真全能有骨肉的上帝。史大林主義者，對於史大林，取道士對龍虎山張天師的態度，只有叩頭，只有拍掌，只有「烏拉烏拉」的呼喊。從日常史大林的生活，誰能分別他與希特勒的差異。紐倫堡四十萬人的國社黨大會時的境况，與莫斯科史大林黨大會的情形，對於領袖的盲從和膜拜，半斤八兩。所不同者，是口號。無產階級革命的領袖，由馬克思到今日，從沒有一個人，當他生時，毫不以爲恥地自稱有「主義」，許他的部下，自稱爲他的主義者；在學術上，也從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他生時，敢稱他自己有歷史階段，有哲學階段……。史大林呢？他在世界人士面前，登身蘇維埃寶座之上，泰然地受「史大林主義」的尊號，任他的徒子徒孫，奴顏婢膝地，在座下叩頭，自稱爲「史大林主義者」，把蘇聯無產階級製造的白紙，寫着不厭煩的歌頌史大林的文章。這些一切，證明史大林的

官僚制度，日夜在努力創造英雄主義。而恐怖主義，就是英雄主義的弟兄。

於是，在史大林的天國裏，有一個共同的發展原則。一方面史大林的官僚，不信任羣衆，用自己的威權去代替羣衆，去壓迫羣衆；另一方面，經不起官僚的壓迫，與英雄主義環境的陶冶，產生了恐怖主義者，在他可憐的腦中，以為代羣衆謀幸福，可不必羣衆參加。也為着這個原因，使尼古拉奕夫的思想，和沙皇時代的民意黨們一樣，以為殺死了蘇維埃官僚的幾個首領，而可以實現他所幻想的歷史行程。

基洛夫就在上述環境下而躺臥于血泊中！尼古拉奕夫以及其他反蘇維埃政權的人固然該死，而創造恐怖主義客觀環境的史大林，成為尼古拉奕夫的最高審判者，這確是不可思議了。

但是，在史大林天國裏，不可思議的事正多呢！歷史常常走她重覆的路途，「鹵莽」的史大林，自基洛夫死後的行為，便是牠的好例子。「誤中副車」，有大索天下的秦始皇，讀史考罵他為傻子；亞歷山大三世被刺時，狩獵黨人，有識者認為

火上加油。基洛夫死後，全國大捕異己的史大林，反有「史大林主義者」，在那裏鼓掌。因為他們都知道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利用這個機會，把他所欲排除乾淨的政敵，用恐怖主義的罪名，送入史大林天國的屠場。把久欲得而甘心的托洛斯基，用「恐怖主義者」領袖的身份，引渡回自己的牢裏。

爲着上述原因，史大林把尼古拉奕夫的名片，於白黨，季諾維夫派之外，再加一行：托洛斯基主義者。托氏對這如何答覆呢？

因爲，當時僅僅是史大林官場的宣傳，還沒有公判這個的表演，所以，他在論基洛夫被刺 (*The Kirov Assassination*) 中指摘前後宣傳的矛盾，恐怖主義發生的原因，史大林官僚在歷史過程中的任務——用自己方法，本自己利益，保衛十月革命的遺產，中有一段說：「馬克思主義對於個人恐怖策略的反對態度，是每個能夠讀寫的工人所明白的。對這個問題的著作，如汗牛充棟。我現在任意地引我自己在一九一一年用德文在奧國定期刊甘波夫 (*Kampf*) 上面論文的一段。無需說，那時是在資本主義統治之下的，該論文中，我寫着：

「恐怖手段，能否——縱使牠是成功的——把統治階級，拋入紛亂的境中，那決定于具體的政治條件。無論如何，這種紛亂只能是短促的時期；資本主義國家，不是建立于幾位部長之上的，也不能殺了他們就可以毀滅，諸階級牠會找覓新的人物，機關還是完整地保存與繼續牠的工作。」

「然而，由恐怖行動對於勞苦階級所引起的紛亂，其爲害更深。若使用一枝手槍，武裝一個人，可以達到他的目的，那還用得着階級鬥爭的奮鬥嗎？若使佔據高位的人物，可以用炸彈的臭味去威脅，那還用得着一個政黨嗎？」

這篇文章，反對恐怖主義者的冒險主義，所採取之無產階級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在二十三年以後的今日我不能再說一句話。……尼古拉奕夫型的恐怖主義，若使發展起來，再加現今不佳環境的援助，僅僅是對法西斯反革命服務而已。

（英譯本第一七頁）

其次，他又指出尼古拉奕夫的供詞，說會對國外某領事接近，自認會由該領事處，領得五千盧布，但他又說：「領事告訴我，若使我寫一封信，由他轉交，可以

與托落斯基發生關係」。這篇供詞，「是在被捕後二十日供出來的」，那末，「容我們姑認這供詞是確實的。容我再承認成爲問題的某領事，確有這麼一個人。容我們姑許他與恐怖團發生關係（在歷史上也僅有這例子）。何以和何故我的名字忽然地在這裏發現呢？或許，這是爲着恐怖團是要找托落斯基發生關係嗎？不，就是格柏烏，也不敢確定牠。或許托落斯基要找恐怖團發生關係嗎？不，供詞中也不敢有如此的胡說。某領事……爲恐怖行爲的目的而給尼古拉奕夫五千盧布，他要求寫一封信交給托落斯基。……某領事會取得這封信嗎？……每個人無需片刻懷疑，那封信是沒有寫的，因爲若使恐怖主義者，詳細地知道托落斯基這個人，那對他沒有什麼祕密的。經過我三十七年革命的和文字的活動的紅色綫索，我的態度與個別恐怖者的冒險主義絕不相容」（同上二六至二七頁）。

可知上面的一切完全是史大林的撒謊，這個撒謊的技術，不只一次表現過。第一次，在一九二七年，史氏先派烏蘭吉將軍的部下，混入托氏的反對派中，而後說托落斯基勾結白黨，結果由史氏自己承認這白黨是他的格柏烏。第二次，在一九二

八年一月，托氏居留中亞充軍地中，拉狄客介紹一外國記者求見托氏，說願爲他帶信給國外朋友。托氏一面告訴拉狄客，這記者是格柏烏，一面交給一篇文文縷縷的什麼都不說的信。結果，第二日早晨，真理報上發表托氏秘密「勾結外國」的證據。第三次，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格柏烏自己在哥拉科 (Cracow) 的 Kurjor Codgrienny 上，發表一個文件，下面偽造托氏的簽字證據，耶魯斯拉夫斯基，馬上把牠影印在真理報裏，證明「托落斯基主義死亡」。第四是亞歷山大王與法部長巴都 (Barthou) 在馬賽被刺時，史大林派的人道報，宣傳托氏亦爲兇手之一。

一個人既撒了多次的謊，那再來一下，自然不算一回事。但十分明白，過去撒謊技術粗劣的史大林，在克姆林宮，却立志要挽回因粗劣而失去的名譽。天下無難事，只怕心不專，日夜專心研究的結果，產生了一九三五年八月的「天才作品」，牠就是轟動全球之第一次公判！

第四 第一次天才的作品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蘇聯官場的通訊社，傳佈一個消息，說：暗殺基洛夫的恐怖以及勾結法西斯推翻黨治的季諾維夫等十二人，將受審判。十九日果然有十六個犯人，現身說法於聯邦最高法院的軍事法庭上面。其中情節的離奇，供詞的新穎矛盾，犯人的態度，都爲人類歷史開一紀元。茲根據蘇聯司法人民委員所公佈之托洛斯基派季諾維夫派恐怖中心的案件紀 (The Case of the Trotskyite-Zinovievite Terrorist Centre)，先作下的簡述：

參加「恐怖中心」有季諾維夫，卡米夫尼，伊夫杜奇莫夫，史米爾諾夫，巴卡奕夫，凡甘甯，莫拉茨柯夫斯基，和杜勒塞爾。這八人都是十月革命前後期間對黨有卓著功勳者；另有賀茨曼 (E. S. Holtzman)，林哥德 (I. J. Reingold)，畢克爾 (R. V. Pickel)，奧爾堡 (V. P. Oberg)，柏門·優林 (K. B. Berman-Yurin)，大衛 (Evlitz David)，姆·露易 (M. Lurye)，及安·露易 (N. Lurye) 八人，其出身與經歷之奇妙，則留于後述。

季諾維夫，卡米尼夫，伊夫杜奇莫夫和巴卡奕夫四人，成立一恐怖團體，叫做

「莫斯科中心」(Moscow Center)，一九三四年該中心執行暗殺基洛夫的任務。經捕拿審察的結果，這恐怖團體的另一個首領，是「蘇聯公敵」托落斯基。他暗令他的同志：史米爾諾夫，凡甘甯，莫拉茨柯夫斯基參加恐怖團，暗中企圖刺殺史大林，伏羅希羅夫，加干諾維赤，奧莊尼克茲，沙唐諾夫，基洛夫等聯邦領袖。國家檢察官維興斯基，根據各犯的口供，要求將該十六條「法西斯瘋狗」全數槍決，托落斯基及其子塞道夫(L. L. Sedov)如在國境上發現時立即逮捕。八月二十四日，審判長宣讀判決詞，再二十四小時後，新聞紙公佈聯邦中委會主席團，拒絕犯人赦免的要求，執行槍決。

現在，我們先說官場的報告書。如果，統計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出版國際通訊(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則起訴書佔七頁，國家檢察官結論佔十二頁半，判決詞佔二頁。犯人的口供綜合起來，不過十八頁，另有兩頁的犯人的辯護詞。由之可知屬於檢察官方面，計二十一頁半；屬於十六個犯人兩個證人的，不過二十頁。再統計司法部出版上述的恐怖中心案件記屬於前者的計八十六頁，屬於

後者的只八十三頁。這是打破世界大案情的作品！

其次，在該書中，並沒有任何真正證據的公佈，僅在文字間，自述是摘自三十六卷的口供！無需說，這口供是放在史大林的抽屜裏！唯一的犯罪鐵證，是犯人的自供。史大林天才的發揮，也就在于這一點。

現在，我們先分析史大林「天才作品」的內容。第一，看「恐怖中心」的組織。這團體是始于何時呢？依犯人凡甘甯的口供，是建立于「一九三一年秋天」

（英文本一一〇頁後面未註書名者均指該書）。季諾維夫答覆維興斯基「是一九三二年夏天」，

卡米尼夫說在「一九三二年秋天」，（根據德語 *Banditsch* 本一六〇四頁）。莫拉茨柯夫

斯基說：「托派與季派的恐怖團，是在一九三二年末成立的」（英文本四二頁）。證人

耶考伏列夫（*Yakovlev*）說：「他與卡列夫共同在科學院反革命集團內工作……一九

三二年秋天季派與托派組織一個集團」（同上七〇頁）。由之，我們明白，所謂「恐怖中心」是在一九三一年秋天，一九三二年夏天，一九三二年秋天及一九三二年末組織的。看呵，殺史大林這麼大的陰謀，有四個不同時期，按照一般審判的原則，應

該再審，但史大林的天國，不需這一着。

其次，誰是恐怖中心的領袖呢？依起訴書說，是季托兩派合組的聯合中心，屬於季派的，有季諾維夫，卡米尼夫，伊夫杜奇莫夫，巴卡奕夫，屬於托派的有史米爾諾夫，凡甘甯，與莫拉茨柯夫斯基（二頁）八位好漢。依莫拉茨柯夫斯基的供詞，「恐怖中心的人物，是季諾維夫，卡米尼夫，羅民那茲（Lominadze），莫氏，凡甘甯」（四四頁）。注意內中要犯羅民那茲，此後不知何處去，此後沒有人們提及他！卡米尼夫的供詞，于指出三個卡派四個季派外，另有一人叫做顧克林（Kulkin）（六七頁），這位顧老爺的大名在維興斯基的耳邊掠過，他的暗殺同志，也忘却了他。此外，卡氏答應維興斯基誰是「嚴守祕密」的中心人員時，又舉出蘇柯爾尼可夫。由上我們知道，所供恐怖團的領袖，也不能一致。

第三，關於「恐怖中心」的活動也有奇妙的供詞。季諾維夫自認，中心成立于一九三二年夏天，而活動的時間「確確實實地在一九三六年前」（四四頁）。但是，我們要曉得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爲着「企圖恢復資本主義統治」的罪名，卡米尼夫充

軍於西伯利亞之民努新斯克 (Minusinsk) 季諾維夫充軍于卡沙克斯坦 (Kazakhstan) 之顧士登妮 (Kustanai)，直至一九三三年中方許回莫斯科來。在這個時期內，彼此不見面，何從計劃成立「中心」？其次，卡米尼夫與凡甘甯都說史米爾諾夫，是全陰謀期內的領袖，而維興斯基自己却說：史氏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起是關在牢裏，事實上他是與莫拉茨柯夫斯基，凡甘甯等關在同一的牢獄。一個在自己牢裏的犯人，成爲刺自己左臂似基洛夫的主謀者，又是「全時期」的指揮者，這只有史大林曉得的。再依巴卡奕夫的口供，中心在一九三二年秋天成立，同時就決定停止活動，至一九三四年秋天方復開始工作（六〇頁）。可是一九三四年末，史米爾諾夫已坐了兩年牢，季諾維夫，卡米尼夫，伊夫杜奇莫夫，及巴卡奕夫，因基洛夫事件，在當年十一月一日入獄，此後，永久關在檻裏，怎能夠跑出來指揮殺史大林的計劃？

第四，我們說到基洛夫被刺。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共產國際機關報 (Rundschau) 自供，兇手的背後是立陶宛政府，「已經證實，駐列甯格勒該政府，和畢生

尼克 (Rissenok)，與兇手尼古拉奕夫有關係，並用五千盧布幫助他準備謀刺。畢氏又負擔傳遞尼氏的手信給托洛斯基的任務」(註)。但在這次公判時，沒有一個人提及立陶宛政府，和畢生尼夫(就是尼古拉奕夫也很少人顧念他)却一變爲托季的「恐怖中心」！

「恐怖中心」的暗殺基洛夫的指揮者，依公判書是巴卡奕夫·伊夫杜奇莫夫的口供，告訴我們季諾維夫于一九三四年秋天，派巴氏赴列甯格勒，佈置暗殺基洛夫事宜，巴氏奉命于當年秋天赴該城，成立恐怖中心(四八至四九頁)。但莫拉茲柯夫斯基的口供，却說一九三四年夏天他遇着卡米尼夫，卡氏告訴他莫斯科恐怖中心，早已成立。卡氏不滿莫氏的行動不靈，又告訴他巴卡奕夫在列甯格勒的工作，十分順

(註) 第四卷第二號二四四頁。我引自紐約先鋒書店版薩茨曼 (Max Shachtman) 著莫斯科

公司的黑幕 (Behind The Moscow Trail) 第三四頁。另依當時官場的報告，殺基洛夫

的兇手，被槍決者達一〇三人，內有十四個共產主義者(同上)，其他是否白黨？這些人是誰，爲什麼史大林不把他們的公判書公佈出來？

利（四三頁）。這一段有許多笑話。公判書不只一次說莫氏是中心的領袖之一，領袖不知莫斯科恐怖中心成立與否！也不知專司暗殺任務同志巴卡奕夫在列甯格勒的工作。一個恐怖團體，難道沒有開會嗎？沒有聽受下層工作報告的機會嗎？難道他不參加指揮的工作嗎（可是他以活動罪名而槍決的）！其次，伊夫杜奇莫夫說巴卡奕夫在當年秋天足跡還未達到列甯格勒，而卡米尼夫却宣佈夏天就已開始工作！季諾維夫則自認是秋天派巴氏進行暗殺工作，根據巴氏的口供，「一九三四年十月，爲暗殺史大林的企圖，在莫斯科組織團體，係在卡米尼夫，伊夫杜奇莫夫及他自己指導之下，而巴氏是負擔直接的任務。及企圖失敗，巴氏走告卡米尼夫」，卡氏另轉問列甯格勒的狀況于伊夫杜奇莫夫，伊氏獻策派巴氏往（六〇頁）。由這幾段供詞，我們又明白：（一）季諾維夫雖以「中心」的名義，派遣巴氏，但實未派遣；而卡·伊兩人則用自己的名義派遣他。（二）莫拉茨柯夫斯基們，曾參加暗殺會議，但議決時不在場。（三）在夏秋間巴卡奕夫暗殺基洛夫的佈置十分順利，但對史大林的企圖却不得手。（四）結果他被派遣赴列甯格勒，在十月前他實未束裝就道，可是他的

魂魄却于夏天已在列甯格勒，對殺基洛夫的佈置工作，幹得十分順利。天嘯：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喲。還有其他許多矛盾的地方，容讀者自己去探討。

第五，我們說刺殺史大林及其左右親信者的企圖，依公判書，刺客是托落斯基的衛兵杜勒塞爾。他于一九三二年秋天，因公至柏林，暗傳史米爾諾夫的命令，謁見托氏。同年九月至十月間，史米爾諾夫對杜勒塞爾說明恐怖的必要。翌年秋天史氏在杜的公寓中促其執行暗殺史大林與伏羅希洛夫的任務。一九三三年春天（Rundschau 作秋天）莫拉茨柯夫斯基，又傳怖恐中心命令給他促即日刺殺聯共及聯邦的領袖（五二頁）。究竟杜氏在那時候組織暗殺的機關呢？還是看公判書。依莫氏的供詞，在于一九三四年夏天（四三頁），而杜氏自稱派加奕伏斯基（Gayevsky）和伊士特爾曼（Estermann）兩隊，分頭殺史大林與伏羅希洛夫，是在一九三五年（Rundschau 一五六六頁）對以上時間的矛盾，檢察官置之不問，辯護士在法庭中亦啞口無言。

還有秉承德國加斯塔普（Gestapo）命令，潛來莫斯科的刺客，叫做魏茲（Er-

anz Wizin) 他與安，露易合謀刺殺伏羅希洛夫。不濟事的他們，執着手槍追隨伏元帥汽車之後，由一九三二年九月起至翌年春止，無法下手（一〇三頁）審判長問不下手的原因，安·露易答詞是，伏氏的汽車行駛過快（同上），後來決定改用炸彈（一〇四頁），究竟炸彈有無到手，曾否施放，都沒有下文，我們只知道洪福齊天的「伏羅希洛夫同志」，是無恙的。安·露易因屢謀不遂，于一九三三年七月移居契立亞平斯克（Cheliabinsk）。另一個托洛斯基專使姆·露易，莫斯科中心命令其近刺殺奧莊尼克茲與加干諾維赤，任並未舉行。爲什麼？也沒有說明。這兩位傻子式的俠客，一九三六年遇于列甯格勒，又圖于五一節刺殺該地黨領袖沙唐諾夫。安·露易自稱執着手槍（不是經驗告訴他炸彈是好過手槍嗎？）。此後有一段審判長（審）與安·露易（安）的奇妙對話：

審 那種手槍（誰給他？從何而來？）——作者？

安 勃郎林

審 口徑多少大？是中型的嗎？

安 是中型的。(爲什麼不是別的口徑?——作者)

審 何以你不能刺殺沙唐諾夫呢

安 我們在行列中，走得很快(一〇五頁)

多麼幸福的沙唐諾夫!

第六，我們如果不追究審判的糊塗，審問的方式，猶如三家村熟師對生徒誦念劇本的滑稽，和每個刺客都是傻子，我們再來探討犯人的自供，這是史大林表演「公判」活劇的唯一特點。世界的新聞記者，以及英國老政治家路易·喬治們的驚奇，也是這一點。史大林主義者，得意誇耀其主人的「公平」，也不外這一點。

每個是有數十年革命經驗的活人，在法庭上懺悔自供，確是有史以來所未見。在史大林統治之下，這種懺悔，可足奇異嗎？不足的。先說幾個例子。當一九三一年審判「聯邦孟塞維克局」(Menshevik Bureau of the Union)時，有一個和季諾維夫們一樣當衆懺悔的犯人，是我們所熟知的蘇漢諾夫(Suhanov)。何以他會那樣瘋狂地自供呢？當時沒有一個人明白，但經過了五個年頭，俄國孟塞維克在

國外的機關報 *Sotsialisticheskyy Vistnik* 用文件公佈牠的真相：格柏烏把蘇漢諾夫關在隔離牢中，利誘威脅，最後訂了一個口約，蘇氏支付格柏烏以自供的代價，但自供公佈後，格柏烏食言，蘇漢諾夫失踪（一九三六年五月十日，我引自薩茨曼著五五至五六頁）。

成爲問題的蘇氏，究往何處去呢？有後日西利加博士的答案：「一九三一年夏天，所謂『孟塞維克公判』，也就是「社會主義局」公判的主角們……約有十人，解到烏拉爾斯克。格柏烏嚴厲地把這一羣人與其他犯人隔離，安放在雖與外人接近的牢中」。但時期一久，大家都曉得那些牢中所住的就是蘇漢諾夫和盧濱們。彼此暗中討論孟塞維克公判的內容，知道當時有兩個人拒絕接受格柏烏的導演，他兩就是布郎斯汀（S. D. Bransteyn）和俄國資本論的譯者老布黨巴薩洛夫（Bazarov）（但他于一九一七離黨）。這兩人，後來祕密槍決。關在隔離牢中者的長期生活，很容易自供的。因爲既然剝奪去做人的意義，黑暗不見天日，求死不得，呼叫無門，牢中的溫度不是難以忍受的高熱，便是在零下的冰冷（向上五月二十七日新鬪爭週刊）

生理上和精神上的虐待，把鉄打的好漢，也輓了心腸。這時候，格柏烏進來了，他對你商談，若使肯接受他的導演，那一切的生活，馬上變易，家屬也可以得到救濟。依西利加博士的報告，有一個做過自供工作的犯人，對西氏說：「格柏烏要求我自供我從未做過的事，如我拒絕負擔我所沒有犯過的罪狀，我懼怕後來虐待的苦楚。檢察官來引誘我，問我是否真愛護蘇維埃政權，我答我是擁護的，那末，我當用行爲去證明。蘇維埃政權既需要我的自供，所以我就必需答應」。我顧到我自己，我家屬，到最後「我答應了檢察官的一切要求」。此後「他立即有報紙，會客，書籍等的待遇，並轉移普通監獄。……在這個牢裏，我後來知道了許多同樣的情形」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八日新聞會週刊)

還有，自公判後，各國的報紙，週刊，多披露上面類似的情形。有的說，所有自供的犯人，飲着麻醉藥，有的說犯人自供，是由于下的原因：格柏烏知道對付革命者的虐待，有時無功的，特地把他的家屬縛在他的前面，或割下耳朵來，或裸體鞭打，使犯人爲着家屬而犧牲自己。我們對有產者的報紙，自然不敢完全信賴，可

是西利加的日擊與塞爾支(Victor Sarago)回法後的同樣自述，堪足證明格柏烏的虐待政治犯屬於確實的事。

季諾維夫們自供的原因，目前我們還不明白(註)，但這些不止一次地對史大林投降過的人，接受史大林的導演，對我們毫不驚奇，因為他們的靈魂，早已死去了。他們在法庭上，自己罵自己，自己大呼不敢向國家要一塊墓地，恭維史大林的仁慈，咒詛「托洛斯基主義」，那都不是不能解釋的一宗事。在史大林主義者看來，這是季諾維夫們的墮落呢？還是這些「法西斯瘋狗」的超脫呢？任何犯人，在死前都需要牧師爲他去懺悔，只有那些有數十年革命歷史的人，在法庭上自我批判。這應看做史大林消滅布爾塞維克革命傳統的成績。用投降的手段，格柏烏的酷刑，摧

(註) 自供可信的程度，看另一段；當他自供後，維連斯基問他：「你現在說真話嗎？」季答：

「現在我由頭到尾都是真話的」。維問：「要記着，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與十六兩日，在最

高法院軍事法庭審判時你也說過，你所說的都是真話」。季答：「在一月十五與十六兩日，

我並沒有全部說真話」。維說：「你未曾說真話，但你也聲明你是說真話的」(七二頁)。

殘革命者的性格，把他訓練成一個忠誠的奴才，每天不是挾着悔過書向史大林求得一官半職，便是由字典中我覓爲史大林揚眉吐氣的文字。本來是沒有是非廉恥之史大林的天國，苟活在該天國中的人，何事不可爲，在史大林導演之下，再扮裝一次小丑，也不算得一回事。

那末，成爲犯人自供箭塚的托落斯基呢？要明白他曾否對季諾維夫們建立恐怖中心，這應看他對於投降派的態度。托氏的性格，是最卑視沒有氣節的人。當季氏們向史大林投降時，他曾暗中寫一封信告訴他的友人，該信被格柏烏所檢查，公佈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真理報上；『第一，這必需完全地明白，「投降者的先鋒隊（季與卡），離開反對派，使國際反對派需要清理所有的分子，要俄國黨的反對呢？還是要「投降者」呢？這，也只有這，是排在歐洲每個團體和每個反對派面前問題；我們毫不憚惜地與「投降者」分裂……第二，季與卡的背叛，是一個歷史的事實』。到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對季諾維夫們第二次的投降，托氏又說；

「他們再來一次投降，……他們最後地沉入深淵。他們個別的命運是非常地殘酷」。自然在史大林主義者的眼中，一個人的著作，一個人的說話，都不能算賬的，除非他所寫的所說的是有利于自己，方肯接受。這樣的思想，完全是史大林靈魂的反映。因為史大林的話，時常變更的，今日的史大林，罵早天已死的史大林，後天新史大林的手，又準備光顧今天史大林的嘴巴。受他訓練過的人，變成了小史大林。小史大林和史大林一樣，自己不知道自己應說什麼，自己也不管自己說過什麼，自己更不負自己所說的責任。以己律人，遂有上述的現象。

話雖然這樣說，在公判書中，不是明明地載着托洛斯基殺人的計劃和行爲嗎？好，我們現在來研究這些行爲的內容。

史大林腦中的「托洛斯基」曾派遣七個專使到蘇聯來，執行暗殺的職務。這七位欽差大臣的面目，值得我們認識的。第一位專使叫做弗來德曼（Friedman），依奧爾堡（Olbars）的口供，弗氏是柏林的托派（七八頁），但在其他犯人和證人的供詞中，沒有一個人提及他，究竟他曾否到過蘇聯，曾否佈置殺人，也沒有一

個人明白。總之弗來德曼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

第二位專使叫做坎德（Alfred Kunt），依公判書，他是柏林托派的勇敢者，可是他只在介紹人優林口中說出他在莫斯科的工作順利（九四頁），究竟後來幹什麼事，到何處去，除史大林外，沒有一個人知道牠。

第三位專使，是我們上面一再提及之安·露易。他自稱是外科專家，受柏林托派差遣到莫斯科來，執着手槍在街上記錄伏羅希洛夫汽車的速度，一年後他避居立亞平斯克，希望可找到別的機會，但他不敢用比手槍更有效的炸彈對待加干諾維亦們，虛度三月功夫，花費托洛斯基——無需說希特勒多少也須破費——的金錢。一九三六年五一節，他在列甯格勒企圖殺沙唐諾夫，因為不爭氣的腿跑得太快，勞而無功。在這些曲折的經過中，他自述一九三二年四月，曾遇「加斯塔普」的豪傑魏茲，共同進行暗殺的工作（二〇頁）。讀者諸君，一九三二年的德國，尙是威瑪共和國（Weimar-Republic）的時代，希特勒還沒有取得政權，「加斯塔普」還未組織，何能預先派遣殺人專使？此後魏茲何處去？也沒有一人知道他。

第四位專使叫做姆·露易。他自供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馬斯洛夫與托洛斯基的派遣者（一〇六頁），那時希特勒執政，馬氏是否還在柏林，我們無從而知。他自一九二六年起是季派，一九二八年隨季氏投降，此後一直至一九三三末或三四初，他還是忠實的史大林主義者。他之接近托派，在他離開德國後。接近的原因，自稱接受第四國際的主張，但一年後又獨立發行刊物于巴黎（薩英曼前著九二頁）。再不管上面事實的不符，依口供姆露·易到莫斯科後，在季諾維夫家，開過三次會。按季氏的口供說「他是道地法西斯」，可是「拉薩爾尙利用卑斯麥」，所以，季氏亦與法西斯的他一起，究竟姆·露易是法西斯嗎？不是的，他是史大林的走卒。他在德共黨中的名，叫做亞歷山大·伊麥爾（Alexander Emel）。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間，史大林的德語國際（Die Internationale）上共黨領袖台爾曼（Eusebius Thälmann）所述之「第三時期」鬥士A E就是他。因為他是史大林主義者，所以，時常受當日德國托派刊物不斷革命（Die Permanente Revolution）的指摘。就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德語第三國際機關報國際通訊上，也常見到他的論文，罵托托洛斯基為資

產階級走狗，由這些身份，可以證明史大林不是審判犯人，是以同志導演他的第一次天才的作品！

第五位專使，叫做優林，他自述一九三一年與柏林托派發生關係，是由托子塞道夫的介紹。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他到哥平哈根見素無一面之托落斯基。托氏告訴他「主要的問題，就是史大林的問題，一定要置史大林于死地」（九四頁）。第二次二人會面時，托氏又告訴他：「蘇維埃裏所發生的事，馬克思並未預言」。由之，恐怖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一致（九五頁）。素稱門禁森嚴的托氏，是否如此地疏忽，我們不得而知，但這位專使終到莫斯科去。依他自供，他在那裏，不與他人往來，獨幹一番事業（九五頁），也就是獨自拿手槍，走進第十三次第三國際大會裏，幹刺殺史大林的大業。不幸他兩次都沒有得到入口證，不得不延長暗殺的計劃。後來究如何被捕，也沒有一個人知道。所有口供，也都是自述。

第六位專使是大衛（Evins Davin），他自供一九三二年與塞道夫發生關係，十二月在丹京見過托落斯基（一二三頁），但優林的口供，說大衛未見過托氏，是他在托氏

面前介紹，托氏答應此事交塞道夫辦理（九五至九六頁）。翌年三月大衛入俄，目的在第三國際第十三次會議及第七次大會中，暗殺史大林。誰知「國際無產階級至高無上的領袖」，無意于國際革命的事務，所以第十三次會議時「並未到場」（二一四頁），致所謀不遂。到第七次大會開會，優林沒有入口證，大衛獨往，他是否帶「中型的布郎林」，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審判長忘記問他。依優林的口供，大衛夾在羣衆之中，無法開槍（九六頁）。看吧，愚獸的托洛斯基，都是派這樣的傻子去幹大事；這還不妙，妙處是優林口中的大會，是「開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九六頁），實實在在史大林的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是在一九三五年七月擇吉開張。愛護「史大林同志」無微不至的維興斯基，連這些不容易的事（註）都忘記了。

（註）第三國際在列甯生時，一年開會一次。第一次在一九一九年，第二次在一九二〇年七月，第三次在一九二一年六月，第四次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列甯死後，延至一九二四年六月開第五次大會，第六次在一九二八年七月，當時史大林派自己規定此後每兩年開會一次，但第七次大會，却延至一九三五年七月！

究竟這大衛是什麼人呢？看窩倫堡（Erich Wollenberg）的聲明書。窩氏是一九一九年短命巴威略蘇維埃共和國紅軍的領袖，一九二三年逃往蘇聯，加入紅軍，得隊長職，一九三二年返德任德共黨紅旗日報主筆，兼「反法西斯同盟」首領。後被召返俄，因要求重往德國工作，被開除黨籍，現居捷克。他在公判後，寫一張公開書給德國史大林派的 Deutsche Volkszeitung，說大衛是他一九三二年主編紅旗報時的同事，又是工會的編輯，「他的主要任務，是格柏烏代理人」。『我又知道由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五間，大衛是「赤卡」在社會革命黨內的秘密偵探』。『我要求貴報編者，不要對讀者遮掩「赤卡」秘密偵探的任務，這些偵探們，現在又同樣地演着被槍決之大衛的角色』（我引自薩英曼前著一〇一頁）。揭穿顯微鏡，所謂托落斯基的專使，原來是「史大林的同志」！

第七位專使，叫做奧爾堡（Valentin Olberg），這位先生的曲折更多。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托落斯基在挪威的聲明書中說：『在一九三〇年初，我要聘一位懂俄文的秘書。我的德國朋友弗蘭茲（Franz Frenpfert）〔著名急進的編輯者

「和他的夫人〔我自傳的譯者〕，接到立陶宛人名奧爾堡的請求書，願赴波林吉普島（土耳其）當我的秘書。弗蘭茲在他的家中，接見奧氏，因為要明白是那一種人。當年四月一日，他寫信告訴我：「對奧爾堡發生了極其不好的與極其討壓的印象」。該信說明，前史大林主義者奧氏，于一夜之間變更思想，同情于反對派，他又立即問及關於俄國反對派，托落斯基生活及狀況等之不應詢問的事」。到底托氏並沒有收這種人做秘書。因為這個宣言，使居住捷克經營照相業的弗蘭茲受該地史大林派的攻擊，並要求捷克政府驅逐弗氏出境。

事實上，奧爾堡是一九二九間，在德語國際通訊上出風頭的作家，一九三〇年因為要當托氏的秘書，一時該刊物上沒有他的名字。一九三〇年七月向托派共產主義者（Der Kommunist）投稿，到所謀不遂，翌年夏天，又在國際通訊上，現重本相。

在公判書上，他並沒有說上面的事；他只自認為塞道夫與法西斯德國的差遣者。他說托落斯基媳蘇沙娜（Suzanna）曾為他和塞道夫奔返丹京與柏林之間（六七頁）

可惜塞道夫夫人的名字，並不是蘇沙娜。他又說，托落斯基在那時「與法西斯秘密警察相勾結」（八八頁），可惜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初，當托氏在丹京時，「加斯塔普」還未降生。一九三三年三月他混入蘇聯，即謀得歷史教職于史大林那巴（Stalinabad），因為他沒有軍役的證明書，不得已返布拉圭（Prague）。他的目的，在行刺史大林，而住居于史大林那巴，這是否紀念他的行為呢？不是的，史大林那巴，和史大林的住處莫斯科，距離二千英里，史大林從未光臨過。看吧，又是一個傻子。謀殺一個人，住居于二千英里以外，這等子要殺住上海的仇人，結廬于峨帽山之上，一樣的滑稽。

爲什麼他沒有軍役證明書呢？因爲威瑪共和國在凡爾賽條約下，不許公民有這麼一會事。所以奧爾堡離蘇。一九三五年三月，他自稱賴「加斯塔普」代理人塞道夫的幫忙，以洪都拉斯（Honduras）人護照，再混入蘇聯。其中二十餘月在布拉圭貴幹，也沒有人曉得，大概他是溫習歷史吧！他告訴我們取護照另一個中間人，名叫杜加里伏斯基（Vladimir Tukalovsky），他是「法西斯秘密警察」，布拉圭

外交部斯拉夫圖書館館長（八九頁），護照的代價爲一萬三千捷克的克郎南（*Krona*）（九〇頁）。後來依杜加里伏斯基的聲明，奧爾堡是圖書館的顧客，研究歷史者，自來自去，未曾對他辦過什麼護照，一九〇五年春，忽然不見（詳見薩茨曼前著一〇八至一〇九頁）。法國工團主義者的報紙無產者革命（*La Revolution Proletarienne*）證明奧爾堡的護照是極其合法的，係由駐布拉圭蘇維埃領事館簽字。至于出賣洪都拉斯護照的人，是在柏林大學研究歷史者，奧爾堡用許多口舌，方以七千克郎南購到，此人願供「國際審問者的召質」。「這裏沒有加斯塔普，沒有「托洛斯基主義者」，沒有一萬三千克郎南……駐布拉圭的蘇維埃領事館，對於護照的來源知道得十分清楚，也知道奧爾堡，他之回蘇聯去是用合法的護照，是用該領事館的護照，自己却在法庭面前，自咒是加斯塔普的人員」（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還有被史大林駐英大使馬夷斯基稱贊過之孟契斯特守獲者（*Manchester Guardian*），同年八月二九日，也證明護照代價不是一萬三千而是七千克郎南，該款一部份是他岳家出賣珠寶供給的，非出于加斯塔普。以後，我們沒有需要，再寫這位「專使」的功績了。

根據上面七個專使面目的分析，給我們明白，大多數是史大林的格柏烏扮裝的。這些人不愧是小史大林，其撒謊之劣根性與史大林等。

然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公判書上，常常說到托氏的書信。這是證據，我們應該論述牠。

第一，各犯人都說有信，而信沒有一封排在法庭的上面。這不說牠，因為秘密工作，需要燬銷的技術，我們要證明牠的真假，還是研究公判書。依莫拉茨柯夫斯基的口供，史米爾諾夫到柏林後，曾帶回托氏主張恐怖的信。然而史氏自供，在一九三一年並未與托氏發生關係，僅與托子在柏林會見兩次。而在莫氏答維興斯基訊問中，却說：「史米爾諾夫對托氏說過話。因為塞道夫對他或對我們都沒有權力」。 (Rundschen 一六〇五頁)。究竟史氏見過托氏沒有？究竟是談話，還是帶信？這還需要一個明白的答覆。

爲着篇幅起見，不再逐一分析所謂信的內容，只舉下面一例，由牠可以反證公

判書內所述的是事實，全部是假造。

賀茨曼依公判書是「托派反革命組織中，一個最活動的人物」。由史米爾諾夫的介紹，以天方夜談某頁爲證，使賀氏秘密與托氏通信。後來他到柏林，用電話與塞道夫約會于動物園，因爲兩人互不相識，各以柏林日報及前進報爲誌而相見。此後「四月中會見六次至八次」。當他將回蘇聯時，塞道夫用電話與他相商同到哥平哈根見托落斯基。賀氏同意，但爲祕密起見，彼此分頭前往，約相遇于該地布立斯托旅館（Bristol Hotel）。供詞說：「我由車站直往該旅館，並在躺椅上會見塞道夫。早晨十時，我們驅車赴托處。到時托氏首先問我關於羣衆及黨員對史大林的態度。我告訴他，我當天要離開哥平哈根，數日後回蘇聯。後來托氏徘徊室內，狀十分不安，對我說，他正寫一封信給史米爾諾夫，但當我離開時，他並沒有寫。我一定要補充一句，我與托氏會話，是單獨的，但托子塞道夫時常出入房間」（一〇〇頁）。依維興斯基的自述，時在「一九三二年秋天」（一〇一頁）。由上述一段話，賀茨曼並沒接到托氏的信，但檢察官演詞却證實托氏有信交給賀氏（Rundschen 一六一頁）。

維興斯基口中的信，依薩茨曼的報告，就是一九三二年三月托氏給「蘇聯執委員的公開信」，內中抗議剝奪公民權，曾轉載于各國反對派刊物上面，內中有一句話，「最後，這是圓滿地執行列寧迫切勸告的機會了：解除史大林的職權（To remove Stalin）」（氏前著八〇頁）。所謂列寧的勸告，就是遺囑（參閱拙作蘇聯黨爭）。如果可爲犯罪的反證，那犯人應是列寧。

其次，一九三二年塞道夫並未光臨哥平哈根，而且他一生也未到過該城。當時，他和他父親會見所是巴黎，這有托夫人給法總理赫立歐（Edourd Herriot）請求的電報，可以證明。然而，賀茨曼的供詞，却說塞道夫與他會見于丹京！

這還不足怪，因爲供詞中，確確實實地指出會見所是布立斯托旅館。有沒有這個旅館呢？有的，若使我們翻閱一九一七年巴德凱（Bardker）編蘇堪的納維亞（Scandinavia），我們確可找到這個旅館的名字，但也只有在該年出版中見到，因爲此後這華貴旅館倒塌，到一九三二年尙是殘垣碎瓦，會留着躺椅給塞道夫嗎？會留着電話給賀茨曼嗎？僅僅這一點，已足證明史大林政權下格柏烏的腐化和懶惰

。既然要公判，公判詞也應做得漂亮；既然要使自己政敵蒙不白之冤，就應把證據假造得使人無從辯護。現在的事實，居然有一九三二年活生生的人，坐一九一七年倒壞的旅館。讀者諸君，你們如本真理說話，應說什麼？這一宗事，可抵得中國史大林主義者，一百種爲教主說教的刊物！

這不要奇怪，這應看做史大林官僚政治的必然產物。無論那個國家，凡是隸屬於史大林旗下的，都是說假話背良心的人。因爲這是他們所崇奉「史大林主義」的主義。

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們明白，第一次史大林屠殺季諾維夫們的作品，其結構之粗劣，其內容之矛盾，其撒謊之超越古今，都爲人類開一紀元。這樣的人，會配得上具有「天才」的尊號嗎？那樣的作品，會配稱天才的傑作嗎？自然不配的，史大林也自知是不配，所以，方有第二次的續作。

第五 新哈姆雷特

繼第一次天才作品的，是以拉狄客，畢亞塔考夫爲首之「反蘇維埃的托洛斯基

中心」。依司法部出版反蘇維埃托洛斯基中心公判書（In the Case of the Anti-

Soviet Trotskyite Center），計有五八〇頁，誠洋洋大觀。細讀這部巨著，有無

窮感慨。就是史大林天才，不僅在政治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學各方面，受他的

門徒的吹拍，就在文學領域，也應留一個地位給他；一些不能吝惜。因爲在該書中

，每個犯人口供的文學化，其文字之華麗，其情節之離異，其表演之精彩，使人在

每頁中，都感到係出自二十世紀新沙士比亞的手筆。沙士比亞只能夠創作戲劇，不

能夠親手導演；縱使他能夠指導演員，排演他的傑作，也不能叫第三國際創造者及

老布爾塞維克登台。現在新沙士比亞史大林君的文學天才，一發揮起來，非獨編一

齣可與沙翁並駕齊驅的悲劇，且能親身在全世界人士眼前導演。爲着這個原因，我

把反蘇維埃托洛斯基中心案件記，叫做「新哈姆雷特」（New Hamlet），我向諾

貝爾文學獎金委員會建議，一九三七年的文學獎金，應贈與史大林先生。無需說這

獎金只能夠報酬史君天才的萬一，只能用爲向二十世紀的人類報告：新沙士比亞的

降生！

到處都是奇蹟，每個奇蹟的創造者，又都是史大林。新沙皇新沙士比亞史大林萬歲！

文學批評家維德爾（Karl Verdor）賞讚沙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時，曾說：「悲劇的復仇必須要有懲罰，懲罰必須要有公理，公理必須要有世界週知，所以哈姆雷特的目標，不是王冠，其首要義務亦不是殺死國王；他的事業，乃是公正的懲罰殺父的兇手，雖然這兇手在世人心目中毫無嫌疑，他並且還要把自己處分之合理，令丹麥民衆認為滿意」。史大林的「新哈姆雷特」，其意義與之相反。他所編的悲劇，不是根據公理，而是本諸權力。牠的目標，是蘇維埃的皇冠。牠的唯一任務，是侮辱「喚醒無產階級」去卑視他自己的政敵。他的事業，是用權力懲罰可使自己損失威嚴的奴才，雖然那些奴才在世人心目中，都知道是爲他效過勞賣過力；他並且還要把自己處分之合理，強全球人士認為滿意。

「新哈姆雷特」的第一位主角是有官做便有理，投降過史大林，且爲史大林充

當掃除「托落斯基主義」的清道夫，畢亞塔考夫。

畢氏在公判時，自供：一九三一年因公至柏林，由史米爾諾夫口中，知道托落斯基採用恐怖主義的「新路線」，並由史氏介紹他與托子塞道夫作初次的會見。塞以托代表的名義，問他「願否負擔鬥爭的任務」，他立即答應，因為「舊托落斯基的主張，還留在他的腦中」（上述英文本二五頁下末註出書名者同）。塞道夫說：「雖然有一九二八年初的口角，托落斯基從沒有懷疑過我，而且還認為我是可靠的戰士」（二三頁）。第二次會見時，討論到經濟的籌劃，塞道夫獻策，向德公司定貨，從中取利。同年十一月，畢氏回蘇，由他的同志施士托夫（A.A. Shestov）帶來塞道夫的一雙靴，內裝兩封信，有P字的給畢氏，M字的給莫拉洛夫（N.I. Murlov），但究竟那一隻靴裝那封信，他也「不能確確實實地說」（三二頁），畢氏閱信「極其駭異」，因為是署名德文「L.T」托落斯基的手筆。無需說這封信是焚燬了，但五年後的畢氏，却能記憶牠。內云「第一個工作是使用一切方法，除去史大林及其親近助手。自然，所謂「一切方法」是指暴力而言。第二，在同書中，托氏說必需聯合一

切反史大林的力量，從事鬥爭。第三，必需破壞所有蘇維埃政府及黨尤其是關於經濟方面的力量」（三三頁）。此後，畢氏在烏克蘭（那裏是他數十年來革命活動的根據地）組織「托派中心」，另由莫拉洛夫在西部西伯利亞組成類似團體。

畢氏一九三二年中第二次因公赴柏林，會見塞道夫時，塞云：托氏甚怒畢等不能立即用事實表現其活動（三六頁）。六至八星期後，他重回蘇聯，與卡米尼夫秘談，卡氏也堅持恐怖的必要。再經拉狄客，施列潑立亞考夫，蘇柯爾尼可夫等的商議，決派畢氏往見「老頭子」——托落斯基。一九三五年末，畢氏又利用公幹，在柏林與托代表議定冒險（他自供與塞道夫會見，都是祕密的，因為柏林很多人認得他，無需說更多格柏烏注意他），乘飛機，飛往挪威沃梭洛（Oslo），護照是用德人（因為希特勒是托落斯基的後台老板）的名字。一到挪威，立即乘坐備好的汽車。進托氏的住宅，會晤自一九二八起未見的托落斯基（六〇頁）。依畢氏的供詞，此後發揮了許多議論——關於政治的議論。說：托氏主張：「單獨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史大林國家的崩壞，絕不可免。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已克服危機，開始變為更加鞏

固」。軍事的戰爭既不可免，托派應起而推倒史大林的國家。但托派的立場，與史特盧威（Struvo）不同，「史特盧威是奉伺資本主義，而我們社會民主主義者（這一個名詞在任何十年來托氏著作中找不到——作者）與之有別。我們與他不同的任務，就在于組織反資本主義的戰爭，就在于栽培掘資本主義墳墓的人。由之，現在我們雖然奉伺史大林的國家，不是援助牠建立國家，而是變為該國家的掘墳墓者——這就是我們的任務」（六一頁）。後來托氏又說，大戰應在一九三七年，須立即練訓同志，負打破蘇聯建設，及幫助法西斯進攻蘇聯（六二頁）。說到國際問題，托氏「告訴我，絕對必需與法西斯德國政府及日本政府成立協定，而這兩國對托季聯合之取得政權，抱有有利的態度」（六四頁）。「他又告訴我，他早長期地與國社黨副主席——喜斯（Hess）接觸」，希特勒助托季奪取政權，他倆則「給與法西斯以下的報酬，關於國際政策的各問題，應對德國的利益以及德國的政府，取有利的態度，某區域租借，也必須履行」，這區域，就是烏克蘭。其次是「允許德國資本，在需要時，開發蘇維埃的富源，內含有開發金礦，石油，錳，森林等」（同上）。還有一個托氏

與希氏的「特別協定」，當國社黨進攻蘇聯時，托派等取敗北主義，充當德國法西斯的嚮導。此外，托氏還對畢氏談及國內的問題，主張更加退讓，允許資本主義貿易，也就是與「右派」的主張一樣，說到這裏托氏希常滿意他們與右派反對派攜手（六六頁）。

所有史大林腦中之奇怪的政治學說，如對希特勒訂立協定，對蘇聯不取保護而取販賣手段，凡是讀過托落斯基一本書及一篇論文的人，都不會相信，現留諸後一節去論述。這裏主要的問題，是畢亞塔考夫會否飛往挪京？如果，我們能證實，有這麼一回事，那畢托的會話，還不失為真確。請大家看哈瓦斯挪京一月三十日的專電：『蘇聯反革命案被告畢亞塔考夫，目前在莫斯科最高法院供稱，渠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自柏林乘坐德國飛機，飛至挪威京城附近，與托落斯基會晤云云。挪威衆議院議員克努生，頃致電莫斯科最高法院總檢察官維奧斯基，內稱：「茲經正氏證實。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並無任何私人飛機或外國飛機，在挪威京城附近飛機降落，余并以托落斯基東道主資格，證實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之間，托

與畢決無舉行談話之可能，可見畢氏所稱各節，並非真相云云。自然，維與斯基的眼睛，不會看這個電文，因為畢氏已以自供的罪名槍決了！

第二個主角，是被中國史大林主義者肉麻地捧上三十四天，現在却貶入十九重地獄的拉狄客。這位著名于波德兩國的革命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與列甯共同建立第三國際。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由他的著作，可知是比史大林高深的。他對於中國歷史（見中國歷史理論的分析）的了解，不管牠是真確與否，比史大林在論反對派中所說的，高超萬倍。總之，在思想及著作方面，史大林再活二十年還不及拉狄。可是自一九二九年向史大林投降起，他成爲史大林的御用代言人，爲史氏無間斷地罵「托洛斯基主義」，在史氏的機關報上，不厭煩地發表恭維史大林的文章。恭維的範圍，非限于政治學，却延及于其他學術部門。看下面的一段：『近代史之演進有如狂風暴雨，在史家面前提出了許多具有偉大意義的問題，但他們在解釋整個近代史方面，總不能擺脫廬森堡和托洛斯基主義的影響，也就可見一斑了。現在提出這種問題的不是我們的史學「專家」，而是像史大林這樣的黨的指導者。』

「在全國推行集體農場運動並在這一運動基礎上以進行消滅富農階級的時候，列寧的得意門生史大林對於農民問題發展的本質和傾向，給了一個非常深刻的歷史析，並一針見血的指出了農民問題，在蘇聯之發展與其在資本主義國家者判然不同。

「在集體農民大會上，他指出了奴隸暴動對於毀滅奴隸制度的作用及農民革命對於消滅封建社會的功能，這種意見，把這一歷史問題進一步的發揚光大而達到更高的頂點。

「在工人階級負擔着創造新技術的使命，要在這方面「趕上並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時候，在斯達漢諾夫運動在提高生產效率的領域中得到了初步的偉大勝利的時候，史大林提出了幾個偉大的歷史問題：在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刺激生產效率之發展的原動力是什麼，並有何不同？如何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矛盾？

「在革命工人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中，中國革命性質問題引起我們

注意的時候，史大林向我們解剖了中國革命的原動力，駁倒了包克羅夫斯基所說商業資本爲一特殊社會制度陳腐的理論（即作者本人亦曾受此理論的影響——拉狄克），並指出了商業資本的作用是起於封建制度解體而且和封建殘餘是混合生長的（圖由我加）。以拉狄客的地位，寫上面充滿與真理開玩笑的文章，誰還會相信他會被派充「新哈姆雷特」的主角呢？

中國史大林主義者，對拉氏行爲的解釋說：這是個人思想與行爲的轉變。我十分同意這句話，因爲由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爲史大林主義者的拉狄客，再由之轉變爲墮落的人，是一個歷史演進的自然過程。就在中國，也可由史大林主義者每况愈下的行爲，得到實證。

拉狄客在「新哈姆雷特」中，担任何種的角色呢？看他的自供：他於申說投降的原因後，指出當日與史大林黨，尚有一個不同的意見，就是關於黨內民主的問題，復黨後，他之墮入深淵，那由于「流行觀念的總和，就是人類關係的總和」（八三頁）人與人的關係，這就是說拉氏與薩發洛夫們的關係，可使他重行加入托季中心

。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他「第一次接到」托氏的信（八五頁）。何以罵拉氏等投降派三巨頭爲「已死」的托氏，會寄信給他呢？從拉氏的自述：「其說明如下：仍與我發生關係的托派領袖，他們當時都與托氏有所往返，知道我是贊助他們的一時退却」（同上）。又說：「自一九二九年與托派分裂起，我與托氏個人的關係，却極其密切。托以爲我是對托派分裂應負責任的人，或者是負最大責任的人。他們自己怕公開對我說，他們又都以爲要克服這一點，只有用托氏與我個別的感情」（八六頁）。因此托氏不念舊怨、與拉狄客通音問。

在這裏我們應知道一宗事，托氏做人的本色，是對於革命氣節一點不能馬虎。不關他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同志，對於革命或馬克思主義有不忠實時，立即斷絕關係。舉個例：世界上研究文學的人都知道伊士提曼（Eastman），英語國家得讀托氏作品的人，也都知道他。就在托氏自己，對伊之翻譯他的三大卷俄國革命史，也表示許多謝意。一九三三年，因爲伊氏在哲學上傾向于修正派，托氏馬上寫一封公開信，寄美國爭鬥週刊，指摘伊氏，內中有一段話。「伊士提曼不久以前，把我三

卷俄國革命史譯爲英文。如一般人所曉得，他對這工作，十分超越。對這一點，我也對他表示無限敬意，而且我還要在這裏重說一次。可是當伊氏企圖把馬克思的辯證法，轉譯爲流俗經驗論的語言時，他的著作，在我的腦中，逗起了一個與敬意相反的感情。爲免去一切懷疑與流言起見，我總應把這宗事公告給大衆，這是我的責任」。爲了哲學，還不厭聲明的人，同時會那樣地容恕拉狄客嗎？

自此後起，依拉狄客自述：他與托氏音問不絕。托氏也提醒他，恐怖手段是必要，最後他加入托季的組織，但「恐怖中心」的領袖莫拉茨柯夫斯基，爲着準備不斷犧牲起見，不把拉氏「放在第一次中心裏」（八八頁）。拉氏也決心，當他們被捕時，自己「行動起來」。此後，他知道許多破壞工業的事。到一九三四年，他又與布哈林會談，布氏也同意恐怖的路綫（九九頁）對於恐怖手段，他自供「沒有實際的經驗，但我由歷史由書籍知道牠」。不僅知道牠，再由比較史大林與沙皇兩國體的区别，還明白目前之恐怖無成功的希望。因此「自開始起，就反對暗殺團的策略」（二〇一頁）。不僅個人反對還與畢亞塔考夫們相商。

又依拉氏自供，他接到托氏幾封信。曾討論關於不可免戰爭的事。『托氏決定戰爭的結果，蘇聯敗北。他寫着，這個敗北，有利于「聯合」的取得政權。由之得到的結論，是「聯合」對矛盾的尖銳，感到興趣。……信中又說，他與遠東某國，以及中歐某國，建立關係』，其獻給該兩國的代價，與畢氏的口供同。然而，他比畢氏，作更具體的演說。第一，敗北主張實行及目的達到後，第一是讓借土地——特別指出烏克蘭。第二，是瓜分蘇聯的領土。第三，把重要工業讓與資本主義國家，把薩哈連油礦讓與日本。對於農業政策，認為集體農場已經失敗，應把機械交與富農，和恢復資本主義制度。此外還要降低工人的生活，不給與民主自由。爲什麼要這樣的後退呢？因爲托氏認為，日德兩國勝利後，必互相爭奪，「我們」再乘此機會，收回一切。（一二一至一二五頁）在沒有這個機會前，「依托氏的建議，退到資本主義是沒有限止的。是退到敵人所要求的界限」（一二九頁）。

由於『根據這樣的政綱……其結果是建立資本主義的制度——這我相信，是促該「聯合」的崩潰與死亡』（一二〇頁）那他怎麼辦呢？『第一步是應該向黨中委會報

告，指出所有人名。這我未曾做。結果，不是我找格柏烏，而是格柏烏來找我」（一二五頁）。維興斯基在上面一大堆供詞完結後，帶諷刺地說：「這是雄辯的答詞」。

「拉狄客答道：『不，是一個悲哀的陳詞』（一二五頁）。維興斯基為悲哀的陳詞，做下的結論：『因為你假定，在我們國家裏社會主義是難能，所以，你認為叛逆是可以容許……但當你看到社會主義的力量是充足是鞏固時你又決定戰爭與敗北都可能』。拉狄客：『你是深知人心嘞……』！維興斯基：『我知道在你的肚子裏藏不着一大批好貨色的話，十分困難地，給一個人縱使是深知人心的人去了解你，去逗誘你說你實實在在所思索的話。但我在這裏審問你的原因，不是把你作為精于國際政治的專家，而是把你作為一個賣國賊』（二二六至二二七頁圈由我加）。讀者諸君，你能夠在哈姆雷特中，找到比以上還要精彩的文字（自然我的譯筆不及原文的萬一嗎？我不敢說不能的，因為是二十世紀唯一天才者史大林的「新哈姆雷特」嘞！

拉狄客近六十頁的供詞，整個是理論式的自白，雖一再述及托氏給他的信，但在法庭上却不能發表一封！所涉的理論，是托氏對於法西斯的估計，對於日德兩國

的態度，對於蘇聯的保護，這都留于後節去述。這裏，我們應知道一點，就是在拉氏供詞中，處處表現托氏信使他。這在凡是知道拉狄客生活的人，都認為不可思議。舉個例：當一九二七年反對派反對史大林鬥爭時，拉狄客站在該派的方面，因此，派內祕密工作的人，多爲他所知道。到一九二九年，向史大林投降時，拉氏爲表示忠實起見，和獵場內的獵狗一樣，在嗅着目的物。恰好被史大林派往土耳其監視托洛斯基的格柏烏布魯姆琴 (Blumkin)，從土耳其因公回國，拉氏立即以過去反對派的資格向史大林告發，布氏是托派。果然在行李中搜查出證據來，立即槍決。後來國際反對派，每于論文中，提起此事，無不痛罵拉狄客之賣友求榮，大有恨不得生啖其肉之概。現在，該派的領袖，與這樣卑劣的人往來，甚至還討論到離奇的政治問題，這除史大林主義者外，沒有一個人肯投一張信任的票。

蘇聯 黨 獄
托派怎樣地勾結日德呢？這任務是由蘇柯爾尼考夫負擔的，因爲他是外交次官。他自供在一九三四年四月，與某國代表談完公事後，翻譯官退出隣室，客人問我：曾否知道托洛斯基向他的政府作某種建議的事。「我承認這宗事是知道的。他又問

這些建議是否鄭重的，我認爲是鄭重的。他問這是否我個人的意見。我說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意見，還是我朋友們的主張。我明白他的問題，是確定某國政府早已接受托氏建議的事實」(二四九頁)。這裏所說「某國」，就是拉狄客自供中所稱割讓沿海濱省的日本。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究竟有否這回事吧？一月二十八日，東京中外商業新報詳述這宗事說：「這全是虛構，乃屬蘇聯方面的活劇。就在英美主要新聞界方面，亦以此種態度對付牠」。他又告訴我們：「外務省當局極度憤慨」。也許，這「憤慨」是故意扮演。我們再研究蘇氏談話的情況，是否合于事實。依大阪每日莫斯科特派員森正藏的報告：「這個自供不確的地方，是外交次官室並無鄰室，有的只在廊下。由我國大使館的紀錄，四月十三日，大田大使確曾訪問蘇氏，可是隨行的繙譯，係今一等書記官島田滋氏，同氏無論何時，緊隨大使。先大使離室，至于今日，一次無之」。

還有許多次要的角色，他們關於破壞產業的工作，爲着篇幅的關係，不再一一

論述。事實上，若使一個人，連國都出賣了，破壞一些產業，算得什麼。所可惜的，是法庭上的供詞，有許多與事實不合。由上述兩項的反證，可以明白。這裏應告訴讀者諸君，對於第二次的公判，我尙未閱到托派的答覆，但我知道紐約先鋒書店，已有新書三本，是給與史大林作第四次公判的參攷。大概在那三書中，還有許多新的反證。這裏不能引用，引爲遺憾。

話雖這樣說，我卻應代史大林君介紹這本「新哈姆雷特」。除上述主角及次等角色所演的悲劇外，我應再介紹一個扮喜劇的小丑，他的名字叫做安諾德（V. V. Arnold），這個人的生史，如不是飄流記中的魯濱遜，他的經歷，堪供寫續天方夜譚者做資料。他的供詞，讀起來和看笑林廣記一樣，把每個閱者的肚子都笑痛。花五頁的篇幅，與維興斯基不厭煩地，問答他四個姓名的歷史。「生而無名」的他，呱呱墮地十個月就被母親送往外祖父處，七歲他進學校，用祖父的名，姓巴西奕夫（Vassilyev），十三歲他移居芬蘭。到再回到列寧格勒時，爲職業的便利，取得當地出生證明書，名巴連汀（Valentin）。經過兩年學徒的生活，他寄居芬蘭叔父處，

不久又在希爾新弗 (Helsingfors) 某傢具廠作工，一年半爲着未來的幸福赴德，護照上的姓名是卡爾·拉士克 (Karl Rask)。在漢堡汽車間做三四月苦工，赴荷蘭的羅特丹 (Rotterdam)，但方到邊境就被警察送回俄國，時在一九一三年。在維堡格 (Vyborg)，他是教堂的顧客，到歐戰發生，懼服兵役，用袋裏拉士克的護照奔逃瑞典，再由瑞典而入挪威」(三〇六頁)。此後，他是航海家，往返瑞典與英國之間。過了一些時候，思家之念，油然而生，乘漁船往省維堡格的叔父。接受叔父的勸導，嘗兵士生活一月有半，因爲「不喜歡戰爭」，變爲逃兵，不幸被執，在列寧格勒，判徒刑六月。期滿，派往里加 (Riga) 最前綫服役，幸得肺炎，約一月被調回後方。供到這裏，維奧斯基罵他：「爲什麼你在初審時，不供現在所說的經過呢？」航海家兼逃兵安諾德悠然答道：「你看，這是極不容易記得的，因爲在我的生活中，有這麼多的冒險呢！」(四〇七頁)維奧斯基此後，又究問他的姓名，他生氣地說：「我正告訴你，我被送往里加附近，你卻不容我說完！我就在那裏第十三西伯利亞聯隊服役的。」

「維興斯基（維）：那你是該聯隊的逃兵嗎？」

「安諾德（安）：我不是從第十三西伯利亞聯隊逃去的。」

「維：你什麼時候在第十三西伯利亞聯隊，在被捕前，還是在被捕後？」

「安：在被捕後。被捕前，我不在該聯隊。你是弄錯了。」

「維：目前所說的，都引自你曾供過和曾簽過字的。」

「安：我在牠上面簽字，以爲你寫的總不會錯。」

「維：這是否說，我有混淆的過失。」

「安：你是做錯了的。我是說，在列寧格勒時，係在亞歷山大第三兵營。」

「維：你的供詞，與上面不同，」

「安：請念給我聽。」

「……………」

「安：好，我現在加補上去」（三〇八頁）。

這一段問答，簡直是演劇。但，我們要注意「我在牠上面簽字，以爲你寫的總

不會錯」這句含有深意的話！當後來問到該聯隊司令官的名字時，安諾德更無禮貌地說：「我後來會告訴你，但你忘記了」（三〇九頁），於是兩個人幾乎吵起來！

後來安氏調到後方，忽然拔擢爲伍長，一九一六年他不希罕這職務，離開軍隊，改名顧爾朋寧（Kulponen），經明斯克而至海參威，又由海參威赴亞爾干吉（Archangel），時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但不知道當時是那一種政府。他又由該地隨美船赴紐約。到紐約後，他不參觀摩大廈而投軍。一九一八年，他參加法國凡爾登大戰，整一年被革，然取得美國公民的身分，改名安諾德。再以水兵資格，遊覽南美阿根廷的京城，往返蘇格蘭與紐約之間，一九二〇年又入軍隊，一九二三年，他應「對蘇俄技術援助會」之招與專家一同赴俄。到這時，他感到沒有信仰路得教的「需要」，暫時祕藏共濟會會員的資格。一九二三年十月，他加入共產黨。後來監察委員會「誤信謠言」收回他的黨證。當維奧斯基問他：是共濟會會員，還是共產主義者時，他驕傲地答道：「我是一個人呵」（三二四頁）。

經過上面一大批的「冒險史」後，轉入正題。自稱一九三二年他以西斯托夫（

Shostov) 的介紹，加入托派。西氏教他幹破壞殺人的工作。一九三四年，他被派暗害奧莊尼克茲和莫洛托夫，但他兩次開汽車時，都不敢下手。要知道，在史大林的作風中，有一貫的弱點，是把托落斯基的「專使」或「同志」，都描寫爲懦夫的典型。有記伏羅希洛夫元帥汽車的露易，自然也有愛惜生命的安諾德！然而依前兩節的述敘，托派中被充軍者達萬人以上，一定不乏才幹之士，只有這樣的人，方配幹暗殺的工作，爲什麼會派遣誤大事的安諾德？讀者諸君，要記着這是史大林文學的創作，不是現實。理想本來是與事實有所偏差的！

「新哈姆雷特」的收場，不是比武和兇鬥，而是斯斯文文地，在法庭上作自我的咒詛。畢亞塔考夫，於罵完托落斯基之後，說：「我深切地知道我的罪惡，我也不敢向你求一塊墳地。我也不敢向你請求寬恕。在數小時內，你將宣佈你的判詞。站在我面前的我，由於我的罪狀，變爲惡濁卑劣，由於我自己的過失，被剝奪去一切東西，也就是變爲失去他的黨的人，沒有朋友的人、拋棄他的家庭的人，失去自己的人」。(五四一)。

拉狄客呢？他的自祭的文詞，美麗極了。他侃侃地說：「公民審判官諸君，在我懺悔背叛國家之後，沒有辯護的理由。……一個在勞動運動中，費過三十五載光陰的人，當他懺悔背叛國家時，不能用任何環境寬恕他的罪惡。我也不能抗議，我是被托洛斯基引入迷途。當我遇着托洛斯基時，我已是一個有成熟思想的人。固然在這些反革命組織的發展中，托洛斯基的任務是可怖的，但當我走入對抗黨的路途時，托洛斯基對我的權威則微小而不足道。我之加入托派的組織，不是爲着托氏可憐的理論，當我第一次充軍時，我早知牠是不值一文。也不是我承認他的領袖權威，是爲着當時沒有別的團體，可以委託我自己所懷抱的那些政治任務。因爲我過去參加這個集團，所以我和牠一起前進，我未曾離開，爲着我捲入這個鬥爭的漩渦中，然而這可算做由於我自己估度情況的結果，又可算做是我心甘意願地所選定路線的結果。爲着這個原因，我負擔全部責任。——這責任你將根據法律根據你以蘇聯審判官的良心而估度之」（五四二頁）。接着他本政治家的本色，指摘破壞蘇聯生產的奸徒，高呼：「我不是爲我所已失光榮而奮鬥，我是爲承認我所供的供詞之真確性

而奮鬥。這個目擊的真實性，不在于本法庭的人們的眼中，也不在于洞悉我們靈魂標記之檢察官與審判官的眼裏，乃在于已知道我三十年，還不明白我如何地墮入深淵更廣大範圍的人們。我要他們從頭到尾明白地觀察，何以我有這樣的供詞，因此，不管那些事實我已經坦白地說過，我覺得我對末期之事變與經驗，應有現身說法的義務，尤其是有表白自我接受托洛斯基訓令起的義務」。於是把托氏與許多同犯罵了一頓，而後說明自被捕後兩月半內決定自供的經過，與袒護布哈林的不該，說：「我倆是深交密契，知識的友誼，是比任何友誼都可靠的。我知道布哈林所處的紛亂境況，恰與我過去的一樣，我又深信他會對蘇維埃官吏，說忠實的供詞」（五四九頁）。最後，他為「公民審判官」提出三點：第一，托派與右派同為黨之死敵；第二，警告在法國及西班牙的托派，應早些回頭；第三，「我們一定對全世界說，對所有為和平而奮鬥的人們說：托洛斯基主義，是戰爭魔鬼的工具。我們一定用響亮的喉嚨去說，因為我們已經用自己的痛苦經驗領教過牠。這對我們極端困苦地承認牠，但牠是一個歷史的事實，為着真理，我們應支付我們的頭的代價」（五五〇頁）。

這些話，簡直是他未入牢前在消息報上的論文。

「我們不能夠——就是我也沒有資格，請求葬身之所，我們是沒有這個權利的。我應該說，我們沒有需要這個墓場。這並非驕傲，在這裏也還有何種驕傲可言呢？在後數年的生活中，在後五年或十載的生活中，世界的命運，應清算明白，那時尚有意義的，只在一個條件下，牠就是：縱使遇最困難的環境，一個人還能夠在生命的過程裏負擔任務。然而，眼前所發生的事情，却橫阻着牠。處那個境況下，坟墓僅僅是變為非必需的苦楚。：：我們都承認是我們所服從之歷史權力的工具。不管我們已有覺悟，所痛苦處，是承認牠如此之遲，但是這個承認，或許可供為他人前車之鑒」（五五一頁）。

又一個蘇可尼可夫，他自製的諷詞中抄耶魯斯拉夫斯基已做過的結論說：「關於犯罪的一般責任——不是我們個別的責任，我重覆地說，我想托派的組織，托落斯基主義的本身，是死亡了，已到達受羣衆的痛恨，已經火化，而不能再行抬頭」

（五五六頁）。

最後，我們看安諾德。奇怪得很。在審問時，十分糊塗，此時忽然清醒，所背的劇詞，也情文並茂。冒頭就非常深刻地說：『公民審判官，在襤褸中，我就由沙皇俄羅斯處遺傳一個「私生子」可羞恥的烙印。爲適應我自己的生活——牠已變爲這樣的紛亂——我能夠把這唯一的譴責，交給沙皇的俄羅斯。因爲我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爲適應自己而生存的。結果，如牠所表現的，我，一個工人的我，勞動階級出身的我，突然墜入托派的陷阱中』（五六六頁）。

以上各犯人，雖然在法庭上，各聲明不敢向國家求一塊葬身之地，但當被判死刑時，又提出減刑的要求，何以如此的矛盾？這一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月三十日判決畢亞塔考夫，施列潑立亞柯夫，莫拉洛夫，西斯托夫等十三人槍決。拉狄客，蘇柯爾尼可夫，安諾德三人，則判徒刑十年。托氏父子，與第一次公判相同，如在國境上發現，馬上逮捕。判決詞宣佈後二十四小時，立即執行。據當日新聞的報告，維興斯基是反對拉蘇等免死的。

公判時著名的角色維興斯基，對於史大林的忠誠，溢于辭色。他究竟是那一種人

呢？值得我們認識的。

典型的史大林主義者維興斯基，就依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出版人名大辭典的記載，其一生大半是孟塞維克。自本世紀開始起他屬於孟派，這可以原諒他，因為那時候的孟塞維克，還沒有反動。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間，他演進一步，屬於孟塞維克右派。那時的孟塞維克，已經糟糕，至于孟塞維克的右派，大半是幫助帝國主義反對蘇維埃。究竟帝國主義在蘇聯的老爺維興斯基，有否拿槍殺過布爾塞維克，因為官場沒有報告，我們不敢亂說。但我們由史大林欽定的歷史中，知道他于一九二〇年才加入布黨，加入後變為第一次公判時他所痛罵之「法西斯瘋狗」的狗首領季諾維夫的小狗。這不是我們侮辱他，就在一九二五年他的大著共產主義簡史 (Sketches in the History of Communism) 中，還可找到他恭維季氏是「布黨的模範」的頌詞。到史大林得勢，他離開季氏，變為不折不扣的史大林主義者，以昔日恭維季諾維夫的態度，轉而恭維史大林，又盡力為史大林屠殺老布爾塞維克。

三月三日比利時布魯塞自由主義者的安地班丹士報，大書：「被告們所自白的

簡單的罪狀，完全不可解。革命家一度成功後，自家被虐殺的行爲，是屢見的例子。看今回的事件，比利時極左派勞動者們，大概不會憧憬「蘇維埃聯邦的天國了」。

(我引自二月五日東京讀實新聞)。

托子塞道夫對讀實新聞巴黎特派員松尾說：「此次被捕縛之人，分爲兩類。屬於第一類中，有的是篤奉列甯的革命主義之純粹革命黨員，有的是態度曖昧的人；另一類，恐與加斯塔普及日本人有關係。可是如拉狄客等過去與我們有關，現在則與托派毫無瓜葛，莫拉洛夫從未屬於托落斯基反對派，且與我們也沒有往來。……此次尚有五六十人被捕，因斷然拒絕自供，早已槍決」(二月十一日)。

還有未槍決未公判的人，依我們所知的，有右派反對派巨頭布哈林與賴可夫(托姆斯基自殺，或云爲格柏烏所殺)，列甯夫人，前格柏烏長官耶哥達，投降派中之巨頭：史密加，普立奧布蘭曾斯基，拉可夫斯基等。布哈林和賴可夫，于二月五日開除黨籍，據云他們成立「西伯利亞中心」陰謀傾覆蘇聯。這些人正待排演史大林的第三次天才作品！

第六 正動與反動

史大林不斷捲起黨獄的理由，是被殺者企圖恢復資本主義制度，與推翻蘇聯。一個有數十年革命歷史的人，會推翻手創的蘇聯，會恢復自己所掃除的資本主義制度，確成爲使人瞠目不解之謎。依史大林心理學原理解釋：這些人，都抱有一個下述共同的主張：由於資本主義安定的結果，法西斯政權日趨穩固，必然有一天進攻蘇聯，蘇聯又必然敗北；所以，爲自己奪取政權計，應乘此良機，勾結日德兩國，自行讓步，盡可能地答應希特勒們的要求，割與烏克蘭與沿海濱省。並恢復資本主義的經營。待自己取得政權，適日德兩國，因分贓不均而互相火併，那時再收回失去的一切權利。

上面的理論，不是馬克思的學說所能夠解釋，也不是辯證法所能夠說明，因爲，整個都是史大林腦中奧拉狄客口裏「天才」的洩露。如果，史大林的天才，可與現實相一致，那只在一個條件之下，牠就是所有作這樣勾當的人，一定是瘋子。已

死的人，究竟他們的神經如何結構，已無從研究，因為他們早化成灰燼。問題是活生生的托落斯基，他是否這樣地生活着呢？

我們在這裏，與中國史大林主義者的估計，走了相反的途徑。那些人，把自己腦漿換裝莫斯科的訓令，只有說明其主人所幹屬於正當的義務，沒有探究及懷疑的本能。那些人，只閉着眼睛，相信他的史大林，不相信他自己。所以，由自己按照訓令做事的矛盾，邏輯到別人，也和他們一樣。結果，他們把自己的矛盾律，套在托氏的頭上，用朱筆大書；其罪屬實，死而無赦！

可是神經健全的人，却不這樣想，他應本事實去判斷。所謂事實，就是指「言」與「行」。究竟托落斯基在言論上，是否成爲「帝國主義的先鋒隊」呢？如果是，其憑證何在？又在行爲上，托氏是否成爲推翻蘇聯的首領呢？如果是，證據在那裏？史大林能拿出來，給我們看的，是兩次公判書。是一九三二年要投宿一九一七年已倒閉之旅館等天方夜談似的記載。是在史大林導演之下的自供。暫不說，公判書充滿偽造，充滿格柏烏當義務的演員，其自供之可信，也成爲重大疑問。按過去的歷

史說來，這種驚天動地的案件，應由國際辯護人參加，以照大公。不說別的，舉刺傷列甯之一九二二年社會革命黨的審判爲例，當時十二個男女犯的辯護者，是第二國際領袖，無產階級專政的仇人樊狄文（Emil Vandervelde）。證據及審判的公平，使樊氏在他的十二個死亡者（The Twelve Who Are to Die）中說：「社會革命黨黨員承認這個事實，並且誇耀這個事實……社會革命黨黨員承認這個事實，所引爲遺憾者，是他們不能成爲武裝擁護立憲會議的任務。……社會革命黨黨員承認武裝反對蘇維埃政府，是一個不可否認歷史的事實」。若使，兩次公判屬於事實，爲什麼，一再冒稱爲「列甯忠實學生」的史大林，不學他老師，允許托氏派律師參加審判的辯護呢？

目前國際社會主義者，進行覆審這個案件，在美國有許多著名社會科學家及革命者計劃成立國際法庭，請雙方列會審判。托落斯基已願意出庭，如果史大林不是偽造，那應派代表參加，使這天大的事水落石出。如證據明托氏是那樣的卑劣，則公判後對他的打擊，比史大林在莫斯科的表演，不更爲有力嗎？

何以歐美各國的社會主義者，不相信托落斯基是反動，和懷疑史氏的正動呢？他們並非都與托氏有何等的友誼——不，有許多第二國際的人物，都曾在托氏銳利的筆鋒下受過批判——乃爲着事實使他們不能不如此。

這事實，在理論上托氏對於蘇聯和史大林的態度，只有一句話：「擁護蘇聯嗎？擁護史大林嗎？反對」。爲什麼也取這樣的立場，請閱蘇聯黨爭。

自被放流到土耳其後的托氏的生活，並未曾與政治脫離關係。由于國際反對派分子的散佈，暗地還在繼續進行他們的政治工作。然而，以他的性格，不因勢力的薄弱，就和與自己政見歧異的人，在反史大林共同目標之下，聯合起來。當中東路事情發生時，歐洲有一批被史大林開除的黨員，如德國的烏爾般(Hugo Urbans) 法國的羅鐘(Robert Louzon)，公開地指摘史大林，說自托氏被逐後，蘇聯已經實現了「特米多」。對中東路採用武力，是帝國主義。托氏特爲文駁斥（見極左派與馬克思主義），指出史大林的官僚專政，是歷史的必然，對於俄國無產階級政權，有一種歷史的任務，並不是反革命；在生產工具國有的原則沒有毀滅之前，蘇聯沒有

「特米多」的實現。一直到目前，他還抱着這個主張。

本上面的主張，他努力做「醫治」史大林記第三國際的工作。依他自述，這醫治並非白費工夫。「在決定證驗以前，拒絕把病人說是死人，或說是病將已經絕望了。但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我們沒有浪費一天在于「醫治」。我們造成革命的幹部，並且同樣重要的準備了新國際之基本的理論，和綱領的立場」（見一九三三年十月氏著蘇聯與第四國際）。

在「醫治」史大林國際的過程中，他最後斷定，史大林的政策會起兩重作用：「今天在已經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並最近的將來也不會有時候，牠用牠自己的方法，保護無產階級的專政；但這些方法，不過便利明天敵人的勝利而已」（同上），爲什麼呢？因爲官僚集團，絞殺了黨，工會，蘇維埃，用整個政治機器，壓在無產者的頭上，又爲抵抗左和右的進攻，必出于屠殺的一途。到革命的幹部一天天地削弱，反革命的力量增大，則有「特米多」的可能。

史大林雖然還沒有墮落到那樣的地步，但欲用和平的方法，移去官僚集團的統

治是不可能的。因此，應在蘇聯內部，從舊黨的健全分子並從青年中建立新的革命的黨。這新的黨，領導無產者，批判史大林的官僚專政，只有這個工作奏效，官僚的集團將會逐漸孤立，孤立到蘇聯的無產階級不能容忍他的壓迫時，則史大林的政權，懸于半空之中。

另一方面，各國革命者，為保護蘇聯計，應挽救史大林國際的墮落，領導各國的工人，以防止後日進攻蘇聯的一幕。只有把帝國主義戰爭化為國內戰爭，方能夠免去蘇聯的危機。同時，用這個方法，不只保護了蘇聯，而且還可以為蘇聯除去她的寄生贅瘤——史大林官僚的集團。本於上述原因，各國的革命者，與蘇聯革命的新的黨，應攜手起來，成立新的國際。

這新國際對於後日蘇聯的任務，依托氏自述，和今日史大林的國際不同。因為：『解體中的共產國際之工具們在各國繼續矢忠於蘇聯，假如我們信賴這些誓言，那真是一種不可饒恕的愚蠢，對於這些人，嘈雜的「擁護」蘇聯，不是一種信仰，而是一種職業，他們並不為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他們對史大林官僚集團洗刷污跡

（看：例如人道報），在危急的時期中，那巴比塞化的共產國際對蘇聯的幫助並不比牠對希特勒的抵抗要強。但革命的國際主義者就不然。十年來被官僚集團不名譽的迫害，他們不倦的號召工人來保護蘇聯。

「當那一天新國際不是用說話而是用行動對俄國工人表明，牠，只有牠，是為保護工人國家而奮鬥時，布爾塞維克——列甯派在蘇聯內的地位將於二十四小時內改變過來，新的國際將向史大林官僚集團提出聯合戰綫反對共同的仇敵。假如我們的國際有一種力量，官僚集團在危險時期便無法逃避聯合戰綫，那時候多年來累積起來的造謠中傷還會剩下什麼呢？」

「甚至在戰爭的情形中，和史大林派官僚集團的聯合戰綫並不是像一種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那樣的「神聖同盟」，他們在帝國主義爭鬥時，爲了欺瞞人民起見，兩方面都停止批評。不，就是在戰爭的情形中，我們仍舊保持對官僚的中派在批評上的不可調和性，中派將不能夠掩蓋牠對領導一個真正的革命戰爭的無能。」

『世界革命的問題和蘇聯的問題可以結束在同一的短的公式中』（第四國際與戰爭

三八至四十頁)。

以上是托派在國際上政治的面目。由他，我們知道，他們不特擁護蘇聯，而且就到自己具有力量時，還要向史大林提議「聯合戰綫」。這與史大林公判書所述，相距如何之遠。

自一九三三年德國法西斯勝利起，有四個工人的組織——即左派反對派國際局，德國社會主義工黨，荷蘭社會主義工黨，荷蘭獨立工黨，集會于巴黎，宣佈第三國際的死亡，決定十一條原則，作為新國際成立的基礎。到一九三五年，除簽名于十一條宣言中之德國社會主義工黨，因領袖的中派傾向退出外，其他三團體，又聯合美國工人黨，加拿大工黨，發表「建立第四國際的公開信」，得英國獨立工黨等的同情，到今日，這新國際的支部，遍于美，德，荷，法，奧，加拿大等國家，就在安南也有他的活動的足跡，無需說，牠的力量，還不足與史大林的國際相比較。因為，這個運動，尚在發展的過程中。如果第三國際的生長，是靠第一次大戰的培育，那麼，第四國際的長大，也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襁母。

其次，我們再看托派與法西斯的關係。就西班牙而言，目前已成爲法西斯無與產者鬥爭的舞台。史大林的西班牙黨，是在內戰發生後出世的。賴着蘇聯物質上的幫助，目前有相當的羣衆，然而與無政府的工團主義，以及統一馬克思黨相比較，則如小巫見大巫。爲着這個原因，史大林主義者用「聯合戰綫」的口號，與資產階級的左派携手，反對無產者奪取政權，反對貧農收土地；無政府的工團主義者，則與統一馬克思黨一致，建立「反法西斯鬥爭同盟」，反對佛郎哥將軍，目前除加泰隆及凡倫西亞兩省，由無產者把土地給與貧農外，在史大林與資產階級軋妍頭式的聯合線佔優勢的各省中，農民多觀望不採取積極的態度，這裏所說統一馬克思黨，就是第四國際的西班牙支部（註）。

如不管理論上正確與否，由西班牙各無產黨對佛郎哥將軍的鬥爭，可以給我們認識一點，是托派也打法西斯的。當西班牙史大林黨與資產階級戀愛，阻止工人管

（註）關於西班牙內戰分析，這裏介紹先鋒書店出版莫勞（Felix Morrow）著西班牙之內戰（The Civil War in Spain），讀之可一目了然內戰的內容與目的。

理工廠，與農民攷收地主土地時，瑪德里某聯隊，在開拔赴前方的遊行中，高呼：「史大林出賣我們的利益，現在又出賣我們的骨頭，我們打倒史大林」。到莫斯科第二次公判完結時，加泰隆各地的無產者，則集隊遊行，指斥史大林手段的無恥。在瑪德里史大林黨請求資產階級的政府，解散遊行的隊伍，並抄攷當地統一馬克思黨的無線電台。爲什麼，有產者這樣寵愛史大林主義者呢？目前，有一個奇怪的現象：被第三國際罵爲勾結法西斯的托派，拚命在那裏用血肉購買法西斯的槍彈；自稱爲反法西斯的史大林，對於西班牙無產階級的革命，不出全力去援助，而忙于與帝國主義強盜在日內瓦的咖啡館——國聯——中談和平。

公判書告訴我們，托氏是希特勒的走狗。希特勒眼中的托氏，確如此的馴良可用嗎？這要用希托的關係史去說明。當希特勒沒有登台前，在國社黨的機關報中，反對托氏的入境說：「托洛斯基，蘇維埃猶太的獵狗，當他被驅逐出國時，要住居柏林。我們應把銳利的眼光，投射在這猶太的刺客與罪人的身上」（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 *Illeustrierte Beobachter*）。到一九三二年國社黨參加選舉競爭時，繪一張圖內刻列

雷，托落斯基，季諾維夫，拉狄客，蘇漢諾夫等一十九人（應義務聲明，是沒有屯大林先生的大名的）的頭，上書「俄羅斯的掘墳墓者」(Russian Grave Diggers)，用爲煽動選民。爲什麼，希特勒這樣地恨托落斯基？因爲當時托氏的論文與他的運動以極大的威脅（參閱新生命出版俄國革與五年計劃）。就在今日，第四國際的德支部，也輾轉于希特勒的暴力之下。

這並不奇怪，妙處在于公判後，意大利法西斯的報紙，稱爲「這是政治的理性，對於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勝利」，法國法西斯的領袖克力里士(M. Henri de Kerllys)在巴黎回聲(Echo de Paris)中先自問：「爲什麼要必需消滅托落斯基主義」？而後自答：『無論蘇維埃警察採用何種特別的方法，都不容許由而做個結論，說歐羅巴的秩序，已從「托派」的極端主義者的勝利中，取消了任何東西。反對莫斯科的統治，決不能放鬆了像不斷革命這樣學說的危險性，請稍爲思索一下，若使托落斯基站在史大林的地位，則蘇維埃成千成萬架的飛機，老早的飛往西班牙。這可以說明一切』（我引自薩茨曼上引書七二頁）

我也說：「這可以說明一切」。

用希特勒金錢而組織的挪威法西斯 Nasjonal Samling，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包圍托氏的住宅，翌日又公開號召同志，攻擊托氏。史大林的挪威黨，對這種舉動，不獨暗地手舞足蹈；且在他的機關報上，抗議挪威工黨政府懲辦法西斯的不法行爲。（同上）換句話說：法西斯與史大林對於托氏，無論何時何地，都是結成聯合戰綫的。

這還不足驚異，更出乎意外的，是史大林的國際機關報 Rundt om 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公開地登史大林意國黨書記尼古勒提 (Nicolletti) 告法西斯老鬥士與法西斯青年團的論文，內說：「意大利國家的青年們，容我們彼此各伸出手來！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天主教徒和社會主義者，以及有各種傾向的人們，容我們彼此握手！容我們手牽手，又容我們一排前進，去奪取如我們這樣文明國家內之公民的生存權。我們有同一的志願：使意大利強大，自由和幸福。……目前我們國家內的統治者，強把意大利的人民，分爲法西斯非法西斯。容我們高舉人民聯合的旗」

幟；麵包，工作自由與和平」（我引自同上書七三頁）。就在法國，我們也看見史大林的人道報，歡迎殺戮波蘭無產階級最好的屠夫羅茲·史米格利（Rydz Smigly），說：『這就是爲什麼以勞苦人民的名義，以法國共產黨的名義，對惠臨敵國的羅茲·史米格利將軍致敬，我們由心窩裏呼喊：波蘭萬歲』（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

以上的話，縱使哥倫布再生，也不能在托洛斯基的作品中，發現同樣的一個字。

尚有托氏對於日本的關係。日本國內一直到今天上，還沒有托派。因此，無反動，也無反動的反動。然而，他（托氏）在對美國「聯合通信社」代表的談話中，曾論述和估計到日本侵略中國與對蘇聯的情形，內中有一段說：『日本已捲入對中國的大事業中，其後果是不可見的。牠（日本）可以有，亦將有，一些軍事的和外交的勝利，但是勝利的片刻即逝，而困難將是永久的和不斷增加。高麗是牠的愛爾蘭，在中國牠企圖創造自己的印度。只有完全頑固自用的封建軍閥才輕視中國的民族運動。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已覺醒的偉大民族，不能用飛機使其服從。在滿州的

肥沃的土地中，日本已陷至膝，假使不是陷到腰……蘇聯與日本之間的戰爭，因此將發展於日本依照與更強的同盟者的協定，有意地和自覺地喊起突衝之時。這一戰爭之目的自然比中東路和整個滿州的問題無限地廣些。有幾家法國的報紙忙於預言說：「布爾塞維克將被埋葬於西伯利亞的平原」。西伯利亞的平原和森林是廣闊無限，在牠中間可以埋葬很多東西，但未必一定就是布爾塞維克主義吧。」（俄國革命與五年計劃二二一至二二二頁）。到他行抵墨西哥，應六千共產主義者之公開演講時，更指出德日兩國進攻蘇聯的必敗。以上的言論和事實，難道不是證明史大林瘋狂政治學說的無恥和卑劣嗎？

史大林對托氏惡意的宣傳，不只一次了。不過這兩次的公判，可說是他最後的和規模最大的宣傳，現在我引一段托氏的答文；「當日本正稱雄于滿州，希特勒正準備稱雄于德國時，史大林則做長篇論文論托洛斯基在一九〇五年的政策，和其他與此同樣時髦的問題。自史大林和莫洛托夫宣佈「托洛斯基主義」死亡和埋葬之後，已過了三年，現在又在蘇維埃報上有一新的宣傳——第五次或第六次的宣傳——

——反對這同一托洛斯基主義。這一宣傳之出乎意外——因為與死屍爭鬥有什麼意思呢？——和攻擊之異常惡毒在歐洲報紙已引起了一點震驚。美國法國的報紙都發表了「托洛斯基」在蘇聯境內的大陰謀之暴露，托洛斯基派從國外每月收受六萬盧布；他們在工業，行政，教育領域內取得了最重要的地位，最妙的是國外補助的總數報告得精確。雖然，這一報告是荒謬，但其背後亦有頗為具體的權威，即是史大林的權威。史大林最近不久宣佈說「托洛斯基主義」不是共產黨內一種運動（如黨員們無論如何仍繼續這樣相信的），而是「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先鋒隊」，假使我們重視這句話，即可以得出以下的一些結論。反革命的目的是在蘇聯重建資本主義，達到這一目的只有靠推翻布爾維塞克政權。假使「托洛斯基派」是反革命派的先鋒隊，那就是說他們正準備着毀滅蘇維埃制度。由此即可以得結論說：歐洲的有關的資本主義各界，一定要慷慨地解囊資助他們的活動』（同上——一〇七至一〇八頁）。

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對這「先鋒隊」的友誼怎樣呢？開一張清單：一九三六年四月，奧國非法的第四國際支部刊物布爾塞維克（Der Bolschewik）被抄殺，同

志被捕。同時，法國的里昂·勃倫（Leon Blum），逮捕該國際法支部青年的領袖芝勒爾（Fred Zeller）（註）比利時政府，以徵集武器，供給西班牙為名，拘捕許多第四國際比支部的負責人。法屬安南，在西貢判決該國際支部八個領袖五年又四月的徒刑。總而言之，這清單告訴我們：帝國主義者對他的最好「先鋒隊」，是最壞的友誼！這些事實，比學沙士比亞的史大林再寫一部新如願（As You Like It），還要明白動人。

我們把托落斯基放在一邊，看史大林怎樣的對待列甯的黨，請閱另一張清單。列氏未死時，布黨由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之間，連任的中委計二十五人。自史大林統治起，這二十五人的狀況如下：

〔自己死亡的〕

列甯，哲仁斯基（Dzherzhinsky），亞提姆（Artem），斯托茨卡

（註）他本是社會黨內青年領袖，後來由經爭的經驗走入托派。在一本小冊子叫做革命社會主義者之路（The Road For Revolutionary Socialists），詳細論述史大林的國際代表人，在

〔爲史大林殺死的〕

季維諾夫，卡米尼夫，伊夫杜奇莫夫，史米爾諾夫，施列潑立亞考夫，莫拉

諾夫。

〔自殺的〕

托姆斯基

〔判處徒刑的〕

拉狄克

〔以反革命罪名被捕的〕

布哈林，頓可夫（以上右派），拉可夫斯基，卑奕洛哥羅道夫（Belogoro-

dov），史密加，普立奧布闊增斯基，克列史丁斯基（Krestinsky）

〔以恐怖反動罪名通緝的〕托落斯基。

〔免職的〕

史塔梭巴（Stassova）

〔尙任中委的〕

史大林，加里甯（Kalinin），安杜勒奕夫（Andreyev），羅茲塔克（Rudz-

ntak）

再說主持政權的政治局，自列氏死後，季維諾夫與卡米尼夫爲史大林所殺，托
姆斯基被史大林迫而自殺，賴可夫被捕，托落斯基被控反革命，剩下來的只有史大

林一個人！

另列氏遺囑上，特別提及的計有六人，季諾維夫，卡米尼夫，畢亞塔考夫被殺，布哈林待罪獄中，托落斯基通緝，又只剩了史大林！

這張清單，若與前節所述之被列甯罵爲「痞子」們的彈冠相慶，應生何種感想，由讀者去判斷，難道列甯的戰友，只有史大林是人嗎？難道許多大人物都是反動，只有不學無術，殘忍不仁，魯莽不公平的史大林方算是正動嗎？

第七 天平上的兩雄

凡熟悉十年來俄國黨爭史的發展的人，對於今日的黨獄，應該不會奇怪的。因爲由史大林執政起的各種設施，可以推測必有這樣的舉動。如果我們退而研究史大林對付托落斯基的方法，即更明白，兩次公判所用「反革命」，「暗殺者」等加在托氏頭上的罪名，也不新鮮。

史大林對付托落斯基的方法，是怎樣呢？在奪取政權過程中，解除雙方政治的

武器——政權——係屬政治家的日常課程，不能列在論述的範圍中。因此所謂「方法」，不是指史大林開除托氏及其同志的黨籍，充軍以及驅逐出國；也不是指在演講台上，大罵「帝國主義先鋒隊」，這一套史大林應說，而且也只能這樣說的話。而指的，是對付政敵的家屬。兩國戰爭不斬來使，兩雄決鬥不及家族，縱使托氏是蘇維埃天國中的罪人，而罪不及其子女，但史大林是否這樣呢？看下的事實。

當一九二八年黨爭時，托洛斯基的幼女塔，因參加反對派，被史大林關在隔離營，並判徒刑五年，這不說他，因為他投身政治運動。時幼女妮娜（Nina）輾轉病榻，及托氏充軍，她養病醫院中。史大林的醫生診斷她是急性肺勝。她將醫治經過寫一封長信報告她的父親，請示此後診治方針，並未涉及政治的事務，為史大林的格柏烏扣留七十日之久，後來忽然死亡（僅廿六歲），死亡的消息，也賴越飛等的報告！

住居土耳其的托氏，應丹麥社會民主黨人之請，赴哥平哈根演講俄國革命史，到達丹京後，托夫人抱病，請求丹麥政府，允她在當地醫治。史大林一面令塔斯社

向歐洲各國散佈「托落斯基派在丹麥會議」的謠言，另一面威脅丹麥社會民主黨政府，立即趕托氏及其妻等出境。

托氏另有肺病的女兒名西娜伊達 (Zinaida Volkov)，自父母離國後，丈夫以參加反對派入獄，被史大林充軍，一九三〇年末，托氏費九牛二虎之力，設法使她帶同五歲幼子赴土耳其療養，經當地醫生診斷，認為應赴德國另請名醫。開始時候，駐土的蘇聯外交官，一再留難，最後方許她離土。她爲着減少負擔，把幼子寄在父母處。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史大林忽下令！剝奪托氏，托夫人，托子及西娜伊達等的國籍。西娜伊達住居德國，是用蘇聯的護照，現在不僅變爲無國籍的人民，斷絕財政上的援助，且與她的丈夫，她另一個在蘇聯的幼子，成爲隔世之人。由她的健康，她早已和政治絕緣，史大林此舉，全爲私人的仇怨。經此一番的打擊，西娜伊達的病狀急趨直下，醫生主張只有迅速送住居土耳其的幼子，以緩和她心理上的轉變。可是這位六歲的小孩，也沒有國籍。花了一年多工夫，毫無辦法。後來賴托氏赴丹麥演講的機會，多方設法使他得居母處六個星期。以後，史大林駐柏林

外交官，商希萊轍政府，驅逐她和她的幼子出境。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她憤于身世飄零，用煤氣自殺，時年三十歲。托氏於十一日，特地寫信給聯共，聯邦政府各中委，仲述其經過，內有一段話：『史大林此種無政治目的的舉動，除無聊的和愚蠢的報復私仇以外，沒有別的東西。我的女兒，非常明白她的處境。她知道在歐洲各國警察手裏，無法安全，由史大林的請求，她到處都免不了迫害，因此，她于一月五日自殺。這樣的死，可叫做「心甘意願」嗎？不，不是自願的。是史大林置她于死地。我自己僅僅報告這樣的消息，我不做結論』。

當第二次公判時，又把托氏的第二子塞爾支逮捕，罪名是企圖毒殺工廠的工人。塞爾支是青年科學家，他自幼就把他的精力，投于科學，素來不感政治的興趣。他不熱心于父親反對史大林的運動，只努力于數理的探討。當第二次公判前，他是一個工廠的工程師。一個人企圖用毒藥殺死他所服務工廠的工人，爲的是什麼？反對史大林嗎？工人是工人，史大林是史大林。是全部工人嗎？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史大林工作的目的，無非是罪及妻孥而已！

對托氏個人，既然有兩次公判的證據，那史大林就應該根據挪威的法律，向挪威引渡，爲什麼他不出此一舉呢？是史大林愛惜一九一八年時他自己所歌頌過又惡罵過之「法西斯瘋狗」的首領托洛斯基嗎？當然不是的。史大林不敢引渡，是爲着挪威的法律，在引渡前，所有卷宗應交給挪威法庭去審查。我們知道，史大林的公判，是表現自己文學的天才，是對世界無產階級開玩笑，不是有什麼證據。所有演員，多半是格柏烏裝演，這種戲劇，只適蘇聯人民去玩賞，只足給全世界史大林主義者去拍掌，不堪入挪威工黨政府之眼。結果，他只好用外交的手段，迫立即將托氏驅逐出境。這個手段，曾引起挪威所有社會主義者及人民（奇怪，法西斯除外）的反對。因爲，按照史大林的判決書，除托氏外，還有托子，爲什麼史大林只向挪威威脅，不敢向塞道夫居留地法國政府交涉呢？對這一點，挪威人赫爾德（Walter Holm）說得好：「或許爲着法國加她的殖民地版圖較大些」。受挪威工黨政府拒絕的史大林，再進一步對該政府說：「此後挪威政府應負擔托洛斯基繼續居住留地所發生的一切責任」。該責任，依赫爾德報告，是繼耶哥達的格柏烏長官葉賀夫（

Yezhev) 派幹員圖刺托氏。

用「恐怖的名義」引渡政敵，不是史大林的發明——老實說，他可憐的天才，從來沒有幹過一次新的玩意兒——係抄襲自希特勒。一九三五年國社黨早用這個方法，要求瑞士引渡德國史大林主義者紐曼 (Heinz Neumann)。因為他是史大林的同志，所以第三國際的刊物，一致反對。聰明的史大林主義者，一面反對，一面學習。最後，以學習所得，施之于托氏。所以，他希望挪威政府，馬上驅逐出境，如露易·喬治所說，促托落斯基作投火的飛蛾，走入史大林天國的屠場。

到托氏得墨西哥政府允許入境(註)時，史大林爲着墨蘇兩國還未訂立正式條約，只得命令駐美大使請美國政府，轉而壓迫墨西哥。千謀百計撲個空後，他只好令墨西哥的工會領袖多里旦諾 (Lombardo Toledano) 通電反對。不爲他爭氣的工人，認識文明國家有保護政治犯的義務，起而攻擊他的領袖。結果，他所屬的油業工會，藝術工會，建築工人工會等，脫離多里旦諾的組織。碼頭工會則訓令工人，不爲他(他是蘇聯非工式駐墨的代表)裝運貨物。

以上，史大林的行爲，都是歷史的前例，不足爲奇。妙處是把托落斯基的一切，都視爲罪惡的泉源。所以，除上述的事實外，再把托氏第一次結婚的亞歷山大·勃郎斯坦（Alexander Bronstein），充軍于西伯利亞。這位女革命者，現年六十歲，在俄羅斯無產者運動中，有四十年革命的歷史。她一直到縛上囚車止，還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如果有的話，那就是她和托落斯基同睡過。

史大林這樣的性格，是可以說明的。列甯在遺囑（見蘇聯黨爭）中，公開地指出他的鹵莽，要求用一個更客氣更忠實的（可見他是粗魯與不忠實）黨員，代替他的位置。爲什麼列甯有這樣的關懷，因爲他深知史大林的性格。這性格，全部是俄羅斯沙皇的化身。

在沙皇統治下，史大林所知道的，只有專制。史大林研究這個專制，學習這個

（註）

史大林訓令全世界各支部及其機關報，以托氏住居墨西哥，作爲勾結帝國主義的證明。這一

種反對保護政治犯的行爲，是違反文明國家的設施。因此，有許多美國學者羣起非難史大林

美國黨機關報每日工人的無知。

專制。自他走進沙皇的皇宮後，他比喜坐龍座的克倫斯基，更進一步。把所研究的，所學習的，一一演之于政治的舞台。因此，羅曼諾夫的一切，雖然在布爾塞維克闊刀大斧之下消失了，他的精神，却附着在史大林的肉體。

爲什麼，這專制的性情，不會發生在別人的身上呢？也許是史大林君的歷史命運，然除這命運之外，還有史大林生活的環境。他一直到今日止，只在倫敦巴黎等地停留過幾天，對於世界是什麼一回事，他和我們一樣，由畫片中去玩賞。他更糟糕處，是只具有斯拉夫文學的天才——這不奇怪，因爲他是俄羅斯人喲——對於任何一國的文字，最了不得處，是能免倒置而觀。他不能獨沒有馬克思主義的修養，就對於任何科學，都沒有了解 and 認識，所以，在他筆下，從沒有見過高深的著作。他的演說和他的性情一樣的粗暴簡潔——這就是他身上唯一的特長，沒有煽動的氣力，沒有華麗的語句。奔馳落後俄羅斯的農民生活中，他所學習的是這個生活的環境；他所能了解的，也是這生活的內容，在他腦裏，簡直不曉得什麼叫做德謨克利西。他見過的是沙俄內務大臣的橫暴，他學習這個暴橫，他練習了以暴橫對付暴橫的

本領，施用之於蘇維埃的黨治。因此，他的政治日程，是暴力，是屠殺，是造謠，他一輩子也沒有希望做到英國議會中政治家的風度。

以上環境，鍛鍊了史大林的性格，史大林的性格，表現在政治家史大林的身上時，是新的沙皇，「新沙皇」三個字，可用爲表現史大林的一切政治生活，

托落斯基恰恰與史大林相反。他隨着革命的潮流，奔馳于歐美各國間。他見過不少偉大的政治家，他接觸不少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目擊資產階級的德謨克列西，他了解比該德謨克列西更偉大之蘇維埃民主。他知道戰勝舊社會需要一個政黨，他又服從黨的紀律。他遵守這個紀律，解除軍事及政治的權力，是他一生失敗的勝利；他企圖利用紀律，在黨內作民主的鬥爭，是他失敗的原因。他失敗，並不使他個人的性格淹沒，這性格是表現在他的才力的上面。通曉各國語言的他，博覽羣書，所涉範圍之廣，使他成爲著名歷史家，文學家，政治家，以及今日唯一繼承馬克思正統的革命者。他的雄狀的演詞，把聽衆煽動得如一團熱火，他的情思並茂的論文，給一個知識份子，當爲吮吸不盡的思想糧食。雖然是無產階級文壇之雄的已

故盧耶查斯基，要在他的面前低首，就是高爾基初次見而時，對這年青的革命者，也說「久仰大名」，縱使是史大林自己，也會在他面前獻過頌詞。他的生活，把他鍛鍊成重氣節的性格！這性格使他今日成爲革命的領袖，但同時也成爲反對他的人的怨府。目前歐洲革命的高潮，和血的教訓，推動無數革命者，集中在他的旗下：受革命高潮打擊之他的政敵，則用「公判」去安慰自己政治的良心。這兩個環境，產生了史大林對托洛斯基，層出不窮的明爭暗鬥。

鬥爭絲毫不能增加史大林的威權，反促速他的殒落。這個殒落，是非常悲慘的。因爲歷史每日在鞭笞他充滿沙俄殘毒——造謠，屠殺，洩怨等等——的良心，在這裏，我提出一個問題：史大林配與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相提並論嗎？

歷史可以對比的，但對比須有前提，牠就是具體的條件。雅可賓（*Jacobin*）專政，是小資產階級的專政，是建立在財產私有權之上的專政，史大林的官僚專政，雖然騎在蘇聯無產階級的頭上，而他的基礎，却是財產國有，在沒有毀壞這個基礎之前，史大林不會充當羅伯斯比爾，換句話說：蘇聯不會發生「特米多」。

然而這裏所謂對比，是指史羅兩人的性格和行爲。對這一點，我們綜合許多法國大革命的記錄，知道羅柏斯比爾，是個「不腐化」的人，他謙遜，不似史大林的夜郎自大。他的演說，充滿革命情緒，不似史大林的陰謀偏狹。

史大林與羅柏斯比爾相類似的，只有取得政權的行爲，與利用政權，剷除政敵的方法：羅氏在山嶽黨裏，不是黑伯特左派，也不是丹塘的右派，而是中派。史氏在布爾塞維克中，不是托落斯基的左派反對派，也不是布哈林的右派反對派，而是中派。雅可賓的中派，聯合右派，毀滅左派；因此，法國大革命後，首先傾覆的是黑伯特們。布爾塞維克的中派，聯合布哈林，打擊「聯合反對派」，因此，俄國大革命後，首先解除政治武器的，是托落斯基們。黑伯特派傾覆後，羅柏斯比爾的刀鋒，立即朝向右派，因為怕他們勾結反動的吉倫特黨，結果，丹塘派在「這就是第一個宣傳自由的使徒代價」嘆息下，走上斷頭台。托落斯基派退落後，史大林的大刀，找着以豬和貓（見蘇聯黨爭）的右派反對派，因為怕他們養大富農的力量，結果，布哈林們也成爲待罪的囚人。

羅柏斯比爾在毀滅左右派的過程中，是用他的口號；「民主主義政府之原則是道德，當牠動手工作時，牠的方法是恐怖」；史大林在取得政權過程中，是用他的老方法：先掛起「列寧主義」的旗幟，而後自命為該旗幟的保護者，其他的人們，則用反「列寧主義」的照牌而加以反動的罪名。雅可賓中派的上台，陸續用恐怖的手段，不斷洒黑伯特與丹塘們的熱血。因為，小資產階級的政權，只能採取這樣的方法。布爾塞維克中派的勝利，開始是驅逐左右派出黨，充軍，接着纔用秘密槍決與公開的屠殺；因為，無產階級專政，迫官僚們只能逐漸地表現他的權威。羅柏斯比爾殺盡了左右派後，冷淡雅可賓基本羣衆——巴黎公社工人的胸懷，因為他殺人太多，給與麵包太少，史大林殺戮黨內的異己，則寒蘇聯無產階級的心，這階級顧慮法西斯在國境上猖獗，容忍騎在自己頭上的官僚。

羅柏斯比爾在打擊左右派時，是用羣衆的力量，史大林在剷除黨內異己時，則用小組織的陰謀。雅可賓中派恐怖的工具，是公安委員會，布爾塞維克中派恐怖的武器，是格柏烏。從實力說來，格柏烏的威權，非公安委員會可望其項背。

公安委員會每次殺人，都經過法庭的審判，格拍烏的殺人，則取祕密的槍決，公判那在排演熟練與政治市場需要的時候。無論羅柏斯比爾與史大林，對自己鋼刀下血淋淋的頭，却懸着不名譽的罪牌。黑伯特派的死亡，是被控爲偷竊衣服，丹塘派的傾覆，是被指爲偽造法令，受宮庭收買，在比利時搶劫。此外，還有一個共通更大的罪名：勾結外國，通同英國辟蒂，拍賣法蘭西共和國。後日沒有一個歷史家，不用充分的文獻去證明是「毫無證據」。但到證明能夠證明時，被殺者，已化爲枯骨。史大林做效羅柏斯比爾，所不同的，是把辟蒂改爲希特勒。

在恐怖過程中，如丹塘派的德斯冒靈引達細托斯描寫專制羅馬的故事：「一人如果自己^不願陷入殺身的危險之中，他對於他的朋友和親戚的死，必須表示欣樂。在列羅之下，許多被殺的人的親戚走出來感謝神明，並懸燈結彩誌慶。人們至少須裝出一副滿意的面孔，一副愉快而安靜的面孔」。所以一個人無論有何種特質，如不爲專制的工具，即不免要引起專制者的嫉妒，而加以毀滅。「一切罪中最大的罪，是不腐化」。「總說一句，在這個政府之下，一個著名的人能夠善終，或一

個在職的人得保首領以歿，那是非常之少的。人家可以將他當作一件新聞，登在報上，而歷史家可以將此事作為百年紀念中的珍聞」（註）。這些情況，在羅柏斯比爾與史大林專政之下，都可以找到的。

羅柏斯比爾在撞着：「國民喲，你們是要共和國。你們對於牠們決定的事實，如果表示不願意，那人民一定因牠支離破碎而被埋歿其下。凡對於被捕者表示同情的人，應當受罰；凡不贊成恐怖政策的人，應當受罰」的警鐘後，開始審判。審判是不許辯護的，恰如伯黑特派著名軍事家霍森所說：「這是一種政治審判，你們證明自己無罪的文書和準備有什麼用處呢？你們還是要被判為有罪的」。史大林與之稍不相同，他指揮格柏烏，不時逮捕黨內反對自己的人，槍決與殺戮，憑自己的高興，只在格柏烏的方法，侵服被捕者的靈魂時，方用公判。公判前懸着法西斯進攻的警號，欺騙政治水平低下的工人！公判後，羅柏斯比爾和史大林在羣衆中，表現出不同的面容。前者，以被告的辯詞，立即受着人民良心的反動。後者，則在

（註）我引自李季譯威廉·布洛斯著法國革命史中卷，以下有引號者均出此書。

時之下，掩蔽了人民的眼睛。是史大林比羅柏斯比爾聰明嗎？蘇維埃天國新沙皇永久沒有這個資格。是因爲羅柏斯比爾的行爲，教乖了他喇！

受公判的革命領袖，雅可賓的左派或右派，都表現出雄壯的熱情和量，譬如丹塘，他的供詞，每新穎而耐思索：「我是丹塘，在革命中早已著名，年三十五歲，我的住宅馬上就會歸于烏有，我的名字，將長留在歷史上」。答辯的雷聲，激動了人民。到判死刑時，大呼：「我們是爲幾個卑鄙強盜的野心所犧牲，但他們不久將取得他們勝利的結果。我拖着羅柏斯比爾……羅柏斯比爾跟着我來」。神色自若地走上斷頭台。受史大林公判的老布爾塞維克，則表現非常可鄙的形式，沒有一個人不自認爲「法西斯的瘋狗」，沒有一個人不顯揚公判自己強盜的公平，也沒有一個人不異口同聲地說不敢要史大林一塊墳場。這不是布爾塞維克不及雅可賓主義者，是爲着雅可賓中派係布爾塞維克中派的老師。

羅柏斯比爾的屠殺過程，凡囚事所過，王黨夾道而立，用嘲笑和侮辱，來對待會壓在自己頭上的黑伯特和丹塘們。史大林的屠殺，則引起各國法西斯報紙的贊美

，受反動資產階級的鼓掌。

羅柏斯比爾屠殺革命領袖的屠夫，是以暴戾恣睢以殺人爲能事的著名裁判官主席德馬，史大林屠殺老布爾塞維克的屠夫，是孟塞維克右派，帝國主義老爺走卒，總檢察官維興斯基！

屠殺的血糞吹過後，羅柏斯比爾爲撫慰自己的良心，埋頭去創造法西斯的「神」，自己爲新的「神」的大主教，于音樂您揚聲中，穿着淺藍色的禮服，像凱旋者一樣，大步而前，作富于詞藻的演說。史大林呢！爲獲得富農與官僚的愛戴，也努力去創造蘇維埃的「神」——牠就是新憲法。新憲法是在自吹爲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實現之下的產物。牠用文字的宣傳，來填平農民與無產者的界限，牠給兩階級同等的投票權，在最好民主美名下將做壞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如果羅柏斯比爾當「神」的創造完了後，在「困苦與專制」面前拋棄他戰鬥時所用的利劍；那末，受史大林主義者所恭維之「史大林天才作品」新憲法的實行，便是開闢邀請反動的大門。拋棄利劍後的羅柏斯比爾，到「特米多」月有丹塘的血，閉塞他的呼吸，在人山人海歡

呼之聲不絕于耳的情況下，高叫「共和國家滅亡了，強盜勝利了」，身首異處，史大林官僚的政權，究到何處去呢？

自然，論述史大林政權的衰落，在目前未免過早。因為史大林的歷史任務，與羅柏斯比爾有所不同。雅可賓的中派，用公安委員會削弱革命的勢力，在財產私有權下，必然有「特米多」的大變，布爾塞維克的中派，雖然用格柏烏削弱革命的力量，但在財產公有下，除非官僚的物質享受，變為不動產等的置立，牠還有自己方法，本自己利益，保護十月革命遺產的功勞。可是屠殺革命者和官僚專橫，必然給反動者以抬頭的機會。也由之，這幾年來孟塞維克右派，和被列甯所罵為「痞子」的人們，逐漸佔據蘇維埃的殿堂。目前，我們雖不能說，史大林會為第二羅柏斯比爾，而「特米多」的前途，于每次屠殺後，却逐漸顯現出來。

總之，現階段的一史大林主義，不獨不是馬克思主義，而且也不是社會主義，牠是促速人類的墮落，而不是抬高人類的尊貴。牠是奴使人類，而不是給人類以意志的自由。牠是阻歷史的昂進，而不是推動歷史。所有史大林主義者，除受他們

欺騙的純潔青年外，大半是自私自利，大半是墮落腐化，大半是失去了自己的良心與靈魂，大半是養成天生的奴隸。因此，表現在人的關係上，是利用與欺騙，表現在實踐上，是革命的騙子。

今日，反史大林主義的鬥爭，是每個社會主義者神聖的義務，是每個為真理而奮鬥者的責任。這個鬥爭是給與後日人類以光明的尊貴運動，這個鬥爭，是解放人類離開壓迫與專制的必需手術。在西歐，只有把「史大林主義」，拋入大海中，方能拯救無產階級，使這階級不受新的和第二國際工賊一樣的欺騙與麻醉。在中國，只有無情地批判「史大林主義」的靈魂，只有殘酷地解剖「史大林主義」的屍體，方能夠使整個民族排除育動的損害。要拯救西歐無產階級的痛苦，要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自由，應解除史大林的政治武裝。

本 書 著 者 社 會 學 科 著 譯 年 表

著 譯 名 稱	出 版 年 月	出 版 處
馬先爾的經濟學說	一九三一年十月	神州國光社
龐巴衛克的經濟學說	一九三二年七月	黎明書局
地租論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黎明書局
雷岱爾著社會主義思想史	一九三三年十月	黎明書局
薩伊著經濟學精義	一九三四年四月	商務印書館
西園寺公望傳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生活書店
羅齊爾著經濟學歷史方法論	一九三六年一月	商務印書館
斯莫拉著軍商制度及其歷史意義	一九三六年一月	商務印書館
日本之軍部政黨與財閥	一九三六年六月	光夏書店
西鄉隆盛傳	一九三六年六月	光夏書店
日本財閥史論	一九三六年六月	生活書店
蘇聯黨爭	一九三七年四月	真理出版社
蘇聯黨獄	一九三七年四月	真理出版社

一九三七年四月初版

蘇聯黨獄

定價國幣四角

著者 鄭學稼

發行人 鄭秉禮

發行所 真理出版社

上海赫德路兆益里五號

印刷所 真理出版社

總經售處 黎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出版社新書

李麥麥先生著

日本明治維新運動 定價兩角

救國哲學 定價七角五分

本書是從哲學上說明中國民族今天救亡圖存之道的著作。它說明了哲學是甚麼，救國應怎樣，哲學如何爲用於救國等等根本問題，實爲任何人所必讀。

論理學問題 定價五角五分

本書以闡明辯證論理學與形式論理學之關係爲主。它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並從中指明了辯證論理學的性質和形式論理學的內容。這是研究論理學，辯證法，新哲學和社會科學所不可不讀之書。

本書係理論地發揮明治維新的本質。詳細說明英法與日德民族統一運動的異同。讀後，可一目了然日本資本主義何以興起，中國何以殖民地化。當此中華民族統一過程中本書爲每個青年必讀的傑作。

鄭學稼先生著

蘇聯黨爭 定價三角五分

本書論述由社會民主工黨成立起，至史大林專政止，布黨中左派反對派・右派反對派與史大林主義之鬭爭，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與不斷革命論之內容。材料豐富，言人所未言。

葉青先生兩大著作

預告

李麥麥著：論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過去和現在的狀況，目前爲何轉變，將來到何處去，中國無產者運動與史大林主義的關係，均爲本書論述的對象，意見正確，思想新穎

家禾先生著：日本與中國

本書論述爲什麼歷史把日本變爲帝國主義，中國變爲殖民地；此後爲什麼中華民族如日之昇，而日本帝國主義則日暮途窮。這是每個青年所必需了解的著作。

上海眞理出版社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7402B

019842



\$0.40